



大会

正式记录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四五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5年7月12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执行主席:班古拉先生.....(塞拉利昂)

下午3时20分开会

新喀里多尼亚问题(A/AC.109/2028和A/AC.109/L.1834)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一开始就不得不遗憾地说,大家并没有听进我关于及时参加会议的呼吁。但我们还是接着开会。

听取请愿者申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今天委员会愿意听取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的请愿者申诉?因为他已安排好于今天晚上返回新喀里多尼亚。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扬·塞莱内·乌热介先生(人民议会)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乌热介先生发言。

乌热介先生(人民议会)(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要代表人民议会祝贺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当选,这体现了委员会成员的充分信任。在卡纳克独立问题以及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问题方面,人民议会愿意与委员会充分合作。我感谢委员会邀请人民议会参加这次会议。

今天我要讲到下列问题:《马提翁协定》六年来的执行结果、穆鲁罗瓦岛恢复核试验问题、卡纳克人民主权的切实组织问题、以及随着雅克·希拉克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设置的政治机器,这个政治机器妨碍卡纳克独立。

去年7月9日星期日,举行了选举为省议会延续任期--这些机构是按《马蒂尼翁协议》成立的。现在让我们看看执行这些协议6年后的利弊得失。

首先,人们在为金钱而竞争。北方省主席利奥波德·若雷迪的个人财富已高达20亿法郎,该省的民选官员月薪5 000多美元。主张独立运动的成员们正以牺牲喀纳克人民而致富。人民失去了他们的解放斗争的势头并仍然处于同过去一样的社会状况。自从执行《马蒂尼翁协议》以来,在努美阿成立了10个由擅自占地者组成的部落。

这些省现在正占据着领导地位。同各省主席亲近的人不工作拿干薪。《马蒂尼翁协议》已造成了一个喀纳克资产阶级。

1998年公民投票的选民已由法律决定。已经有一个独立国家的法国人正参加投票。《马蒂尼翁协议》就这样剥夺了喀纳克人民--一个被殖民化的人民--自由决定其政治前途的权利。

局势决不是正在恢复平衡。相反,三省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距依然如故。

为了对付《马蒂尼翁协议》,并在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背景下,第二次人民大会和32位传统的要人1994年9月24日在那拉特奇·阿拉马单方面宣布了喀纳克人民的主权。1853年9月24日法国窃取了我们的国家,通过残暴的殖民主义单方面在该国全国建立起它的主权。喀纳克人被赶到属于殖民国家的保留地上去。在新喀里多尼亚有37位主要的传统领导人,其中32位通过1994年9月24日在那拉特奇宣布喀纳克人民的主权而行使其权利。

在这样单方面宣布喀纳克人民的主权之后,人民大会一直以传统方式在8个文化领域组织喀纳克人民以便组成基本的人民大会。这个组织,独立于政党和选举,按传统习惯行事。我们的战略旨在根据传统作法实行人民民主,以纠正和避免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即由政党而不是喀纳克人民决定问题。所有喀纳克人民都生活在这一传统范

围中。自从选举雅克·希拉克为共和国总统以来,法国由保卫共和联盟政党执政,恢复在穆鲁罗瓦环礁的核试验证明了这对喀纳克独立是一个危险。大溪地的独立问题和核试验问题是相关的。希拉克总统的这一决定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受到反对,特别是在大溪地和新喀里多尼亚。如果希拉克要在爱菲尔铁塔底下或在爱丽舍宫引爆他的炸弹,法国愿不愿意?对法国来说,没有什么危险。

南部省主席属于雅克·布拉克的保卫共和联盟党,他已宣布打算将公民投票推迟30年。法国政府尚未作出反应,但希拉克当选后,可能采纳雅克·拉弗勒的建议。南部省主席希望依赖1995年7月9日省选举的结果,根据这一选举南部省现在属于反独立运动,而北部省和洛亚蒂群岛则是亲独立运动的。在选举省主席中,现在已没有一个多数党,而只有一个多数联盟。

在1975年6月22日正式要求喀纳克独立之前,争取喀纳克人民尊严、自由和特征的要求促进了喀纳克人民的联合并成为所有解放斗争和反抗的源泉。

今天这一反抗促使我们采取一种一元化的传统作法,即喀纳克人民大会的作法:要求事实上尊重喀纳克人民的神圣权利—承认他们是另一国的人民;应认为他们是喀纳克民族唯一合法的人民;尊严和自由地行使自决;收回他们所有土地以成立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喀纳克国家;立即无条件或无限制地行使其主权,这将使它能自由选择其地位,即以我们传统结构为基础的喀纳克社会主义独立。

我们要求尊重和切实、迅速执行法国政府的各项宣言,这些宣言在NAIVILLE-LES-ROCHES承认我们的固有和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喀纳克人民要求承认这一权利,正如戴高乐在世时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权利一样。

1983年7月的《NAIVILLE-LES-ROCHES宣言》承认喀纳克人是该领土第一批和合法的居民,并因而有固有和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喀纳克人民是这一权利的唯一拥有者。一个殖民大国不能将一个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弃置,也不能剥夺这一权利。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立即同主权和独立的喀纳克人民建立优惠的关系。

我们肯定我们的存在,它根植于我们的文化特征和我们自己的传统价值之中。我们向我们祖先的在天之灵致敬—它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和我们共同传统的来源,并以此重申我们对喀纳克人民文化特征的承诺。

我们的传统是生活,我们的长老们向后代宣布了我们文化传统的基本原则,并以此确保了我们的习俗和智慧代代相传,直至今天。我们努力在我们自己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喀纳克社会主义独立并为使我们的传统特征得到承认和保护而斗争到底。

在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期间,法国政府在喀纳克某些领导人的帮助下并通过反民主和专制手段,设法在新喀里多尼亚搞了一个为期十年的重新殖民化和合并喀纳克人民的计划,以维护其私利。这是法国政府设下的陷阱,对此我们一直不断予以谴责。

共同市场开放后,新喀里多尼亚受到欧洲经济共同体12个成员国的殖民化,从而加强了罗卡尔计划。

因此，喀纳克人民注意到他们的习俗和权利处于危险中。公民投票法第60条剥夺了传统人民管理自己土地和发展的权利。

《马蒂尼翁协议》并不保证独立，它通过新体制结构进行不加控制的开发使人民相互不和。这正导致我们文化和技术的毁灭，喀纳克人感到悲伤。

考虑到法国在1853年9月24日单方面接管我们的国家、在长达141年的对喀纳克人民的殖民压迫中的种种错误行为、执行旨在毁灭我们文化和习俗的《马蒂尼翁协议》，剥夺了喀纳克人民自由决定其未来的权利的1998年自决公民投票，以及喀纳克人同其祖国的疏远，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和32位传统首领1994年9月24日在那拉特奇·阿拉马单方面宣布了喀纳克人民的主权。

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将按照人民民主、并在我们传统结构的范围内进行，以建立独立于使喀纳克人民四分五裂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喀纳克社会主义。

我们要法国单方面恢复喀纳克人民的主权。我们呼吁所有独立主权国家和国际公众舆论承认1994年9月24日在那拉特奇·阿拉马宣布的喀纳克人民的主权。

请愿者退席

东帝汶问题(A/AC.109/2026)(续)

应主席邀请，路易斯·曼纽埃·哥斯达·杰拉迪思先生(葡萄牙议会议员/社会民主党)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哥斯达·杰拉迪思先生发言。

哥斯达·杰拉迪思先生(葡萄牙议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连续第三年以葡萄牙议会社会民主党籍议员的身分就东帝汶问题在特别委员会发言。我必须承认，有时我对这一崇高事业感到非常沮丧，这主要是因为各政客和各国家态度虚伪，并且采用双重标准，而且还因为国际社会缺乏公正和有尊严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心愿。

然而，一种莫明的感觉告诉我，东帝汶的局势即将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帝汶人民20年来所遭受的苦难、折磨和屈辱在不远的将来会改变，实现自决和自由所必需的条件将得以奠定。我承认，这个目标并非就在眼前，但是道路已经铺平，必要的工作似乎即将开始。

令人遗憾的是，在大赦国际1995年报告中，东帝汶仍然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在1995年人权报告中也占了很大篇幅。关于东帝汶，该报告指出，在寻找1991年帝力事件——我将它称作大屠杀——之后失踪人士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兵力仍然很多，很不合理。该报告接着指出，各非政府组织和新闻记者在进入东帝汶方面仍然遇到困难，或者被拒绝入境。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种情形仍然存在，我本人以及毫无疑问特别委员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感到这是奇耻大辱。虽然如此，而且尽管印度尼西亚独裁政权态度恶劣，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使我认为，我刚才所说的新道路即将铺平。

帝汶人民代表今年6月在奥地利布尔格施莱宁举行的会议似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比较大的一步。对于会议的结果，有人表示怀疑，有人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的确，与会者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他们不能自己解决的问题。这些会议必须继续进行，我促请联合国鼓励与会者寻求共同的谅解因素，以免在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方面遭受挫折。我深信，以贝洛主教的知识、智慧、以及对其人民的热爱，他参与会议是当时以及今后这些会议取得成功的核心因素。

我个人认为，第一次会议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积极的，因为这是一个开端。另一项重要活动是葡萄牙外交部长杜朗·巴罗佐博士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1995年7月8日在日内瓦的会晤。我们都知道，他们以前也曾会晤过若干次——确切地说是五次。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会议并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结果，但是这次会晤似乎略有不同。新闻发布稿提到要保存和促进东帝汶的文化特征。毫无疑问，这种性质的声明应该受到欢迎，这些声明本身就体现了在争取实现国际上可接受的东帝汶问题解决办法方面所采取的积极步骤。

葡萄牙议会有幸组织和举办了东帝汶问题议会间国际会议。会议于1995年5月31日、6月1日和2日在里斯本举行。代表32个国家的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取得了成功,毫无疑问,在整个善良人类所进行的这一场国际斗争中,所有与会者所作的许多贡献将产生积极结果。

会议一致通过了《里斯本宣言》,《宣言》强烈谴责了印度尼西亚。会议还制订和通过了25点国际行动计划。我谨指出,在昨天的会议上,已经提到过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我相信,这个行动计划将是一项重要工具,可以迫使印度尼西亚接受东帝汶人民的合理与合法的要求。

东帝汶人民的人权、文化价值和尊严、以及自决权利早就应该得到尊重。对于善良人类而言,目前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这种状况是对文明的羞辱。

我要提一下,今年,我制作了一块匾,以纪念里斯本会议。我昨天把它放在这里了,遗憾的是,我只有这一块。但目的是将它献给委员会,以纪念这次会议。其目的是提醒委员会每个成员,东帝汶必须获得自由。我今晚将返回里斯本,我将保证尽早通过我国驻纽约代表团向委员会赠送这块匾的复制品,以纪念东帝汶问题里斯本会议。愿上帝保佑所有从事这种一伟大的崇高事业的善良人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哥斯达·杰拉迪思先生所要表示的姿态。遗憾的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我们仍然表示感谢。

请愿人退下。

应主席邀请,曼纽埃尔·托马斯·罗德里格斯·奎洛先生(国会议员/葡萄牙社会民主中心民众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罗德里格斯·奎洛先生发言。

罗德里格斯·奎洛先生(国会议员,葡萄牙社会民主中心民众党)(以英语发言):我代表葡萄牙国会中社会民主中心民众党的代表发言。人们谈到葡萄牙非殖民化进程时,常说这个进程虽然雄心勃勃,但却是虎头蛇尾。

1974年4月,那些默默地梦想着民主的人们以他们的勇敢推翻了统治了这个国家命运近50年的殖民主义政权。在国内需要制定崇尚基本自由、不论人们的肤色、种族和信念如何而尊重所有人的人权的一部新宪法。一个由所有新兴政治力量组成的议会把这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汇编写在纸上,从而赢得了权威,他们又把这种权威赋予自己的工作。

在国际上,必须鼓励殖民地争取自决的英勇斗争,迅速明确地承认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种文化和一个领土的独立性。

然而事实表明,葡萄牙政府想要在东帝汶实行的非殖民化将受到不同的对待。当时要处理的问题是600,000人的命运,以及其中大多数人希望继续留在葡萄牙管理下的愿望。当时的葡萄牙政府无疑也对东帝汶目前的局势负有政治责任。把管理的权力转交给过去选择的政治力量的办法是有其弱点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办法绝不当被当作违反一切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决议进行占领的借口。我补充一句,印度尼西亚作为会员国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决议。让我们不要忘记1975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事占领东帝汶一事立即受到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谴责。

众所周知,从那时以来一直对东帝汶人民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至今这种政策已造成超过200,000人伤亡。1991年11月大屠杀的情景还留在我们大家的记忆中,成为东帝汶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殊死斗争的象征。

国际社会有责任使印度尼西亚理智一些。应当敦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确保这个人民、这个领土和这个文化的自决权——或是承认葡萄牙作为东帝汶管理国的地位,其唯一目的正是为了实行完全相同的程序。此外,所有向印度尼西亚军事政权提供武器的政府,应作为紧急事项停止这样做。否则,这些国家将被视为对屠杀负有直接责任,而且违反了目前对这类贸易的禁运。所有国家的政府和议会都必须确认需确保东帝汶人民的人权得到印度尼西

亚当局的尊重,违反这些人权的任何情事都必须让世界舆论知道。

释放所有政治犯是我们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首先作出的表示诚意的姿态。

四天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以及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在日内瓦就东帝汶问题举行了第六轮会谈。该领土人民的自决权利当时是,并将继续是所有分歧的中心问题,直至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能说这两个国家对这个事项的任何其他实质性问题都有争执。事实上,同众所周知的违反人权情况(在委员会会议中再次强调了这点)一道存在的问题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长期以来拒绝承认人权、拒绝进行合作以使东帝汶人民能够行使这种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在东帝汶问题上,印度尼西亚不是与葡萄牙冲突(他们宁愿是这样),而是与国际社会冲突。大会第37/30号决议申明了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就在最近于6月初在奥地利举行的以前曾得到印度尼西亚官员批准和支持的和解大会上,所有东帝汶政党发表的一项声明中一致重申了这项决议的原则。

因此预计国际社会将继续努力,加强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压力,要求它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考虑到东帝汶人民的特别权利,达成国际上可接受的东帝汶解决办法。这些步骤应成为进一步向前发展、开始真正使该领土非军事化的进程,以及接受联合国代表团常驻东帝汶的条件。

请愿人退下。

应主席邀请,米盖尔·乌尔班诺·塔瓦雷斯·罗德里格斯先生(国会议员/葡萄牙共产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塔瓦雷斯·罗德里格斯先生发言。

塔瓦雷斯·罗德里格斯先生(国会议员/葡萄牙共产党)(以法语发言):我叫米盖尔·罗德里格斯,是葡萄牙国会中的共产党员。去年我在向特别委员会请愿时,对国

际社会未能实施《联合国宪章》表示遗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非法占领东帝汶约20年;该国政府拒绝尊重安全理事会关于撤回其部队以及毛比拉人民实施其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各项决定。二十年来,那里的人民抵抗了压迫者、继续进行着捍卫自己民族特征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企图为兼并东帝汶找借口提出的理由不值一驳。这些理由是根本不可接受的;是荒谬无稽的。但是苏哈托将军利用他的国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战略重要地位建立了一个合谋网络。美国和澳大利亚事实上已承认了对尚在葡萄牙管理下的东帝汶领土的非法兼并。

尽管阿里·阿拉塔斯外交部长不断地说需要有建立信任措施,在帝力代表占领国的将军们的行为就好象东帝汶是一个反叛的殖民地,大赦国际的年度报告证实说,该领土违反人权的情况继续存在,并且种类日益增多。许多被拘留人员,诸如萨尔瓦多·萨门托,受到酷刑折磨。

德福先生昨天在委员会所谈他个人经历的情况说明局势可怕。然而,他的证据反映的却是现实。

几乎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大使的东帝汶占领军前司令赫尔曼·曼蒂里将军,把他的部队在圣克鲁斯大屠杀中进行的残暴干预,说成是一次“正确的行动”。这种话本身暴露了苏哈托独裁政权的心态。

事实证明,尽管雅加达政府时而承诺,但是,印度尼西亚实际上不仅一直反对就该领土的未来问题进行认真谈判,而且反对国际观察员在东帝汶进行例行调查。它还拒绝让国际新闻界和与保护人权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入该领土。

确实,雅加达政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正在继续参加由秘书长主持的同葡萄牙的直接会谈。最近的一次这样的会谈在上星期举行,两国的外交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谈。然而,因此抱有任何幻想就太天真了。不尊重它自己表示尊重最基本人权的承诺的雅加达,最想要的就是拖延时间。支持东帝汶法学家国际论坛组织的瓦妮莎·拉莫

斯女士昨天在这里告诉我们,她所参加的以秘书长名义召开的会议,正变得越来越象例行公事,已经不再具有严肃性。需要改变做法。

自从圣克鲁斯大屠杀以来,局势显然已经发生变化。印度尼西亚独裁政权清楚地知道,武力占领东帝汶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问题。雅加达感到难堪,因为声援毛巴拉人民的世界运动的声势正在帮助揭开该政权的真面目。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西欧联盟的大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一些国家议会所采取的立场,都使雅加达受到挫败。

然而,美国继续同印度尼西亚政府保持特权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因素。华盛顿的友好政策正在推动苏哈托将军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在这次入侵中,美国同印度尼西亚串通一气是众所周知的——这一点我在这里的中央公园中又得到了证实——而且已经受到过无数次的谴责。承认这一兼并非道德性的姿态。人们曾希望现任政府会改变政策。现实已经戳破了这些希望。确实,许多国会议员对东帝汶境内违反人权的问题越来越敏感。同样确实的是,大众媒介正在采取一种捍卫毛巴拉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立场。

然而,美国的官方立场却虚伪之极。行政当局不能否认它完全清楚地了解在东帝汶所发生的情况。国务院最近一份关于人权局势的报告,在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章节中,为我们提供了噩梦般的描述。报告中应有尽有。报告承认,在东帝汶,酷刑和其他“残酷和非人道的”惩罚司空见惯,如任意逮捕和因宗教理由而进行迫害。然而,克林顿总统在东帝汶问题上采取一种如果不说是伪善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态度。在茂物,他就东帝汶只肯泛泛而谈;他对苏哈托将军所表示的同情令人震惊。正如东帝汶行动网组织的查尔斯·沙佩纳先生昨天在这里强调的那样,这种政策充满矛盾,暴露了华盛顿与雅加达之间串通一气。事实上,正如沙佩纳先生所说,印度尼西亚已经成功地会在国会中找到一个为它辩护的人。

几天前国际法院在海牙宣布,它没有权利对印度尼西亚作为管理国就所谓《蒂汶峡条约》提出的起诉作出判

决。《蒂汶峡条约》是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签署的,以开发蒂汶石油资源。国际法院拒绝作出判决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并不承认海牙法院的管辖权。但是,葡萄牙捍卫东帝汶人民的立场已得到加强,因为最高级国际法院已经强调该领土处于被干涉的局势,即处于被非法干涉的局势。毛巴拉民族的自决权利因此得到国际法院的承认。这一行动具有极大的道义和法律意义,它所发生的时间,正是在世界上有一场越来越强大的运动,反对印度尼西亚违反联合国决议,在东帝汶推行的罪恶政策。

印度尼西亚在奥地利施莱宁举行的蒂汶人士会谈之后的表现,是说明他们在政治对话中缺乏任何道德概念的最新行动。奉雅加达的命令,来自领土内地的合并运动的代表们宣布他们在同来自外部、主张自决的伙伴们达成协议之后刚签署的文件中有两点部分无效。应该指出,雅加达政府的这些代言人首先拒绝的就是提到1982年11月23日的第37/30号决议。

最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使世界公众舆论特别注意东帝汶人民的痛苦:即根据葡萄牙议会的倡议,于5月31日至6月2日在里斯本举行的议会间会议。这次会议在此已经得到详细讨论。

来自30多个国家的议员和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无数知名人士,宣布他们决心继续和加强对毛巴拉人民的声援。在一致通过的《里斯本宣言》中,我们看到了一项真正的行动纲领。我愿再次回顾该纲领的其中四项要求:要求采取措施,使禁止向印度尼西亚出售武器的措施更加有效,而这些销售已经受到欧洲议会的谴责;立即释放泽纳纳·古斯芒和在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拘留的所有蒂汶政治犯;由泽纳纳·古斯芒和抵抗运动的代表参加在联合国秘书长名义下举行的谈判;以及印度尼西亚尊重联合国关于东帝汶的各项决议。

我希望委员会尽力确保在联合国内听到里斯本会议提出的这些要求。里斯本会议也提出一个希望,本委员会可以为实现这一希望作出贡献:即由联合国宣布12月7日——即入侵那一天——为东帝汶国际日。

经过20年的斗争之后,毛巴拉人民已经成了人类的一个集体英雄,他们正在并将继续抵抗占领军。帮助这一杰

出的民族赢得它争取自由的战斗,是一项人道主义的责任。正如我在里斯本会议上提出,并在本委员会面前重申的那样,能否打开毛巴拉自决的大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路易斯·菲利佩·迪亚斯·阿马多先生(葡萄牙议会议员/葡萄牙社会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马多先生发言。

阿马多先生(葡萄牙议会议员/社会党)(以英语发言):我作为葡萄牙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葡萄牙社会党——的一名成员在此谈谈东帝汶人民的自决问题。

委员会清楚地知道,在葡萄牙国内人们并不把这一问题看作是一个党派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它确实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已触动葡萄牙的公众舆论,引起媒介的注意,并且已经把葡萄牙社会和决策者们,把总统、议会和政府都动员了起来。

在葡萄牙议会中,对东帝汶问题的基本一致一直鼓励着特别委员会评估该领土局势的工作,这一议会委员会已经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很大的努力,争取使这一问题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这些努力的高潮就是1995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里斯本举行的各国议员间关于东帝汶问题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成功,清楚地证明了对东帝汶事业的国际支持不断壮大。会议使32个国家来自所有各个政治方面、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宗教敏感性的代表汇聚一堂,团结一致促进东帝汶人民尊严的事业,团结一致捍卫这一民族的特征性和传统,团结一致捍卫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会议通过了一些将在联合国内采取的行动,加拿大议会议员已在这里介绍了这些行动。它们包括印度尼西亚履行其责任,给东帝汶人民以国际法赋予他们的自决权利。葡萄牙根据它受联合国承认的东帝汶非自治领土管

理国的地位,曾试图采取适当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和七十四条的规定,促进东帝汶人民行使其自决的权利。

这是过去几年中葡萄牙外交的指导原则,葡萄牙坚信外交是使东帝汶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唯一途径。一方面,我国的外交活动已促进国际社会更加深刻地了解东帝汶的困境。这是推动联合国按照国际法继续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的一个必要的因素。在人权委员会,在这一特别委员会,在欧洲议会或西欧联盟中,葡萄牙一贯捍卫毛巴拉人民的权利,他们是印度尼西亚不可容忍的暴力的受害者,印度尼西亚的行为完全象一个殖民国家。

但在另一方面,葡萄牙一直在秘书长主持下同印度尼西亚保持直接会谈。这些讨论在震惊文明世界的1991年11月12日大屠杀之后,获得了新的势头。这次大屠杀突然使东帝汶更明显地展现在世界面前,而国际上对印度尼西亚的压力立即增加。

这一谈判进程最近导致了同样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帝汶内部对话。帝汶人之间的持续对话对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必要的。正如葡萄牙一贯阐明的那样,帝汶问题并非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之间的双边问题。它首先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问题。

各国人民决定其命运的权利是联合国所创建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自其成立以来,70多个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已作为主权和独立国家而成为本组织的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就是这些国家之一。

非殖民化的努力是由各国人民享有平等自决权利的原则所指导。只有帝汶人民采取受到联合国承认的自决行动,东帝汶的非殖民化进程才算完成。葡萄牙将接受这一自决行动的结局以及该领土由此产生的政治地位。

同时,印度尼西亚无视联合国决议而对该领土的继续占领,不仅是对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权威的挑战,而且是对其建立冷战结束所要求的新世界秩序的能力的挑战。

这不仅仅涉及解决非殖民化最后问题之一。它也表明不仅能够根据政治现实或力量平衡,而且能够根据持续

捍卫各项原则和价值来决定联合国的活动。广为人知的是,冷战的结束产生了一种对各国人民及少数民族权利的新意识。联合国的活动应越来越多地以这种新意识为焦点。

东帝汶不同于科威特,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它的占领也不对任何大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不过是一个小的非自治领土,其人民未被允许就其政治地位的问题畅所欲言。联合国确保有关该问题的审议得到执行的能力,将显示联合国在确保弱国和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方面的效力,以及它执行《联合国宪章》信条的能力。因此,在国际公众舆论的眼中,联合国的合法性受到决定性的考验。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帝力摄政者多明戈·M.达斯·多雷斯·苏亚雷斯先生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苏亚雷斯先生发言。

苏亚雷斯先生(帝力摄政者)(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和其它特别委员会成员给我机会在该机构发言。鉴于这是我首次出席会议,在进一步发言之前,我谨向特别委员会介绍一下我自己,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对我所负的责任以及我应对我的祖国和东帝汶人民所作的坚定承诺。

我叫多明戈·苏亚雷斯,是一个在该省长大而且目前居住在那里的东帝汶人。我现在荣幸地担任东帝汶首都帝力的摄政者。我曾出席过下列论坛:1992年的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于1995年6月3日至5日在奥地利布尔格施莱宁举行的东帝汶内部全面性对话;以及上星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西班牙港举行的关于非殖民化的讨论会。我还多次陪同东帝汶总督欢迎前来该省的访问者。这些访问者包括外国记者、外交官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及人权组织的代表。我于1990年至1993年任帝力市长,也有机会会见包括阿莫斯·瓦科先生在内的秘书长的代表,他访问了该省,以观察1991年11月12日帝力的不幸事件的善后情况。我曾作为东帝汶体育代表团团长访问澳大利亚,参加阿拉福拉运动会。

我谨阐述一下我对特别委员会正就东帝汶问题进行的辩论的印象。确实令人沮丧的是,看到作为请愿者而出现的同一批国际组织如何表达毫无根据和完全消极的观点,这种观点与出现在其刊物上的关于我的祖国局势的同样偏见相吻合。他们似乎意在发动一场联合运动,不是为了促进人权,而仅仅是为了自私利益。在此表示的特别是关于公证审判的观点与这些请愿者的行动相互矛盾。鉴于国际社会对东帝汶问题不断增加了解,这些绝望的个人利用包括先进通讯手段在内的每一种现有的方法,来误导国际社会对印度尼西亚的看法。我迄今在本委员会中的观察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仅有几个少数成员参加会议的情况表明本委员会对该问题缺乏兴趣。另一方面,从这样一大批请愿者出席来看,把本委员会改名为“请愿者委员会”会更合适。我可以向各位成员保证,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请到1 000多名与会者作为请愿者发言。但这并非讨论该问题的正确论坛。

我本人是最近进行的东帝汶全面性对话的参与者并听到所表达的不同观点,但我从未听到如此毫无根据的指控。我感到这种行动的动机令人费解,在座的任何人怎能比东帝汶人自己更了解东帝汶人的愿望?我们并未选出所有这些请愿者代表我们发言,因此我想一定有一些其它隐蔽的个人议程,它们涉及的不是东帝汶问题及其人民的愿望无关,而是与东帝汶及东帝汶人民毫无关系的其它外部问题。

我以请愿人的身分在委员会发言,以便向委员会介绍东帝汶的真实情况。我意识到,对联合国而言,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葡萄牙是否仍然是东帝汶的管理国?东帝汶是否可以被视作非自治领土?东帝汶是否需要有一个代表为它发言,谁应该任命这个个人或国家?非殖民化过程是否真的没有完成?是否可以让东帝汶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其中包括选择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

我认为,为了了解东帝汶局势的真相,有必要回顾历史事实。在这方面,我要强调,葡萄牙已经不是一已经不再是一东帝汶的管理国。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实呢?葡萄牙当时作为殖民国未能在该领域完成非殖民化过程。

在此有必要简略地提到我的这些观点所依据的各项因素。1975年6月1日,东帝汶的政党之一民协拒绝与葡萄牙殖民当局对话,因为众所周知,葡萄牙支持左派组织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革阵)。1975年6月25日,葡萄牙迅速地从该领土撤到阿陶罗岛,从而放弃了对东帝汶的一切责任。从那以后,殖民当局逃回了里斯本。基本上葡萄牙使该地区陷入内战和内斗,这实际上是葡萄牙一手造成的,这首先是因为它使该殖民地没有任何政治管理机构,而且它在监督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权方面总的态度是轻率的。

依我看毫无疑问,葡萄牙殖民当局所采取的有偏见的立场酿成了血腥内战和混乱。这导致革阵拒绝参加由葡萄牙召集有四个其他政党参加的1975年6月澳门会议。1975年11月29日,革阵在殖民国公开支持下,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东帝汶独立。这也促使代表东帝汶多数居民的蒂汶民主联盟(民盟)、特拉博希斯塔党和科塔党于1975年11月30日决定请求与印度尼西亚合并。在这方面,有必要指出,葡萄牙外交部长在1975年8月22日致秘书长的信中承认,暴力冲突正在席卷邻近地区,葡萄牙没有能力控制局势。

在葡萄牙表示它没有能力履行管理国职责之后,在它过去的行为促成了这种失序现象之后,葡萄牙是否仍然可以被视为东帝汶的管理国?我不得还质疑葡萄牙以东帝汶管理国身分履行其历史、道义、法律和政治责任的依据。难道葡萄牙永远都不会接受有关东帝汶的事实吗?或者葡萄牙永远都不愿意承担挑起暴力和流血事件的责任?

东帝汶已经不再是非自治领土,因为在1975年12月17日东帝汶临时政府成立之日,非殖民化过程就已经完成。事实上,由于该领土爆发内战,在管理国猖狂离开东帝汶之后,临时政府承担起了责任。当时,临时政府作为东帝汶人民的代表要求联合国协助在该领土恢复秩序和稳定。但本组织并未响应,东帝汶临时政府不得以其人民的最佳利益为重,决定采取适当的行动。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对联合国为什么仍然将东帝汶视为非自治领土这个问题,我感到大惑不解。

与此同时,同样令人费解的是东帝汶以外的任何人如何能声称代表东帝汶人民的愿望,尤其是东帝汶人民已经行使过了自决权。而且,东帝汶已经有一个得到其人民支

持和信任的合法政府。为什么还要继续讨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必须指出,我们的议会是代表东帝汶人民观点的机构。正是这个机构代表东帝汶人民签发了合并请愿书,因为它坚信,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是解决几十年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无数问题的最可行办法。通过这一行动,我们摆脱了殖民宗主国。我们东帝汶人民有决定我们前途的不可剥夺和固有的权利,我们已经做出了这项决定。

我认为,联合国组织的使命是支持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各国愿望。联合国也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适当场所。因此,我们殷切希望本组织尊重我们人民的决定。东帝汶人民永远都不要再面临内战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在任何社会,内战都是一个可怕的难以克服的负担,虽然已经过了许多年,我们仍然在努力克服这个遗留下来的负担。我们这些经历过这种悲剧的人永远都不愿再面对内战的恐惧。东帝汶重新回到非殖民化过程就是背叛那些在失序和混乱的日子里饱受折磨的人。

东帝汶人民现在盼望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未来。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为发展而作更大努力。我们正处于建国的微妙进程。只有东帝汶人民自己才能够明白什么对他们最有利和找到将引导该省实现和平、正义和稳定的道路。我们承认奇迹不能在一夜之间实现,但是我们有理由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感到自豪。

东帝汶人民公认,造成我们家园繁荣是重要的,它是提高该省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各个部门有了若干重大发展:交易、卫生、贸易、农业以及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在教育部门,我们正在稳步提高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学校教育有9年是强制性的: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强调学生从早期开始进行具体培训,以使其日后能自立。在农业领域,东帝汶南部正在开发,特别强调的是农工业。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将促进其发展。我们还鼓励熟练的农民,最好是信天主教的,在这个地区定居。

宗教在这个省起着重要的作用。已决定在东帝汶每个区造一所天主教堂。我工作的帝力区将新建四所教堂。还决定建立一所大的神学院进行高等教育。应指出在1974年殖民统治结束时,该领土约有100所教堂。今天东帝汶

的宗教生活主要是天主教，有70多万教徒和800多所教堂。因此，声称有宗教迫害的请愿者是蓄意颠倒黑白。天主教会也同政府机构合作，进行将会证明对居民是有益的计划。

关于我们人民的文化特征，我可以有充分信心地说，自1975年以来，文化生活得到了发展。德顿语现在是东帝汶人民广泛使用的语言。至于葡萄牙传统，该省的街道仍以葡语命名，教堂中有些弥撒也仍以葡语进行。保存了历史文物。我知道在其他前葡萄牙殖民地并非如此，在那些地方葡萄牙殖民传统遭到了破坏。我要问这些请愿者对于我国人民的文化特征是否比我们知道的更多，而我们却不知道。

根据1974年第5号法，地方当局享有更大的自治，并被授权就有关其区的利益自行做出决定。这促进人民朝着规定的目标和优先项目工作。我们认为为了应付未来的挑战，每个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努力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我还要说我们高度赞赏国际组织的努力，它们对该省福利的全面改进实施了若干计划。我们衷心希望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所十分慷慨提供的发展援助将继续下去。

最后，关于葡萄牙的立场，我了解它正在试图纠正过去不负责任的行动。但是，解决任何误解的道路是通过同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合作和对话，尤其是处理东帝汶的发展前景。我还要呼吁本委员会为东帝汶人民声张正义，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承认他们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决定。我敦促本委员会支持我们对和平发展和个人机会的憧憬。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何塞·马丁斯第三(东帝汶KOTA党)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马丁斯先生发言。

马丁斯先生(东帝汶KOTA党)(以英语发言)：几天前，我和代表东帝汶政治框架内若干立场的东帝汶领导人21年来首次有机会在奥地利的施莱宁堡坐下来、会谈和思考，这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好意和努力的结果。应把这包罗一切的帝汶人之间的会议视为联合国的杰作，因为它使同

血源的兄弟在一起讨论20年前发生的可怕内战所造成的一切问题。这次会议也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周年纪念的同一期间进行的，旧金山会议关于世界和平与进步的理想是全人类受益并使他们产生了更大的希望。

作为东帝汶人民的子弟，并根据我们祖传的礼节，要列举曾一度关怀和关心我们和解的所有人的名字的作法，我们现在向奥地利政府表示深切谢意，它是欧洲联盟的新成员国。事实上，所有帝汶领导人都十分高兴在欧洲的一个和平、有秩序、信奉基督教、关心和尊敬的国土上受到奥地利政府的帮助。当然，这在我们所属的亚洲人的活动场所中将永远铭记。

在此，我们再次有帝汶政治老手和新手们听取所有发言者和/或请愿者将说的一切。我本人于1975年12月在联合国总部作为东帝汶人民的代表之一首次登台。因此，我将一如既往地以我通常的坦率和诚实发言，不论发言可能会使有些政治力量或大国如何不高兴。

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正是必须谋求和平而非战争或对抗的时候。我们每天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并用头脑和心灵收到的消息都明确表明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动荡时代，存在着可能影响无辜人民、各民族和各国的潜在危险情况，这些人民、民族和国家到目前为止还躲在到二十一世纪初不再被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护伞下。

人类思想的显著变化已导致在应受到传统知识市场日益关心的各领域都取得重大技术和经济进步，因为人们可以从贸易关系中积累庞大优势，在面临被迫失业情况的社会中改善生活水平。因此，必须通过摒弃旨在破坏新的全球积极缓和并在受人引导而认为下一个政府制度想一劳永逸地纠正世界上所有邪恶的人口中造成痛苦、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政治集团理论，争取进步和发展。没有任何政府、意识形态或宗教可以改变人类条件，但是一个好的政府，公正的意识形态和诚实的宗教确实可以帮助改善人性。

因此，在可以把东帝汶问题描述为仅仅是以印度尼西亚政府取代葡萄牙政府的问题以前，必须正确对待和分析这个问题。的确——我请大家以历史文献而不仅仅是观点证明我错了——帝汶岛问题是一个两方面欧洲殖民主义的

范例，它的后遗症是这样一个容易理解的理论，即帝汶岛东部地区的整个人口都属于一种同印度尼西亚群岛毫无关系的文化。这种解释是不成立的，其主要理由是：如果东帝汶人同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古老文化没有任何关系或联系，也不是从这些古老文化中产生，那么它们来自何方？我国超过35种语言、方言和次方言为什么都有一些词和传统用法完全符合300多种印度尼西亚文化中的一些文化？

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已同意在联合国秘书长阁下主持下讨论东帝汶问题。这项成就是通过两国外交部长间的双边会议取得的。但是，促进这种部长间对话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帝汶政治领导人从未有过秘书长六月在奥地利所提供的机会。现在情况不同了，联合国的作用必须受到最高度的赞扬。

在奥地利召开帝汶会议后作出的结论是，人们期望的帝汶人民对外国直接干涉东帝汶表示支持不会出现，但协商一致的意见是，东帝汶人大多是同一宗族的非常关切的儿子。因此，利用东帝汶来激怒印度尼西亚的不断企图遭到了挫败，因为帝汶政治领导人毕竟都致力于我们人口各阶层的福利和进步。

实际上，在我们在奥地利开会前的几个星期中有人进行了大量宣传，好象要求独立的人更有能力抵制那些选择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人。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在我们敬爱的主教兄弟的影响下，一首歌颂热爱东帝汶过去、现在和今后世代的神圣赞美诗感动了我们沉默的心。我们一分钟都不曾怀有由著名的葡萄牙和非葡萄牙新闻界所编造的“仇恨”，因为我们不是反对危及我们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岛上兄弟们生命的法国核爆炸团体的政治玩物。我们也不想忆及经过34年后，安哥拉仍处于战争状态。实际上，我们给世界作出了尊严、勇气和智慧的榜样。我们重视贝罗主教要求首先在和平与和谐条件下满足我们人民最佳利益的呼吁，而不是许多控制宣传的团体仍非常珍惜的革命原则。这一次，我们没有重犯受三个大陆上葡萄牙革命者影响的错误，这些革命者1974年在里斯本发动的政变曾导致血腥内战和我们人民的民族耻辱。

在联合国代表目睹下我们在英国召开的两次和解会议都是“敞开的大门”，使秘书长阁下在使帝汶政治领导人聚会方面得以取得成功。随后，葡萄牙外交部长若泽·曼努埃尔·巴罗索先生通过大致宣布不应视印度尼西亚人为邪恶，而应把他们视为好的人民，展示了正确的判断力和明智的政治家风度。我们把这项声明理解为对在葡萄牙参与各场无情的运动，攻击“一切印度尼西亚东西”的一些葡萄牙政治极进主义者发出的真诚警告。因此，我在此向葡萄牙外交部长及其副部长夸尔廷·桑托斯先生致敬，他们培育了我们各方之间互相接受的有利气氛。

继续坚持帝汶岛两部分间的假设分歧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不正常情况是按照两个殖民国家——即荷兰和葡萄牙——的利益，在没有其土著当局作出任何帝汶法律决定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荷兰人于1949年离开，1974年葡萄牙管理当局悄悄地、令人意想不到并单方面地作出同样决定，而没有询问东帝汶人这项决定是否正确。人们可以援引在当时激烈进行的内战中不断流血这个论据。但事实是，葡萄牙在理解的情况下没有模仿以前的历史实例，根据这些实例，葡萄牙的存在如果受到危险，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要求赞成葡萄牙驻留东帝汶的帝汶人给予保护。葡萄牙为什么没有在1975年要求其忠实的帝汶支持者取代葡萄牙文职和军事代表？这仅仅是因为有一项建立敌对和危险领土基地破坏印度尼西亚稳定的“革命项目”。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帝汶岛东部和西部间的所谓的殖民界线还会存在。有这么多看来是关心我们人民命运的学者、科学家和制造舆论者，我只能认为他们或是都看不见，或是远远没有诚意。为什么阿曼班努飞地的殖民边界线是从斯拉保河（蒙他阿因）到塔法拉河？这并不是——一条直线一直往下走，而是先向右，再往下，又向左，是通向南海岸的一条弯曲的路线。其原因正是老的拉克马拉斯王国和拉麦克南王国拒绝征收“芬塔斯”——一个王国每年因葡萄牙的存在而缴纳的强制性税收，以及因拒绝附合，终结帮而产生的罚金，终结帮是普拉卡·德努萨·帝力总督在设法把一些王国拉到葡萄牙一边后组织起来的。

至于这块飞地，它是1851年为了补偿葡萄牙廉价出售在葡萄牙天主教影响下的岛屿，葡萄牙与荷兰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因为该飞地是在潘特马卡萨里，对帝汶檀香

木出口人征收很高的关税。飞地不包括最早的帝汶地区，在那里葡萄牙人大约于1700年在巴保海滩建造了、后来又烧毁和拆除了有历史意义的利法要塞。

东帝汶问题的解决办法要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就必须在科学、历史、法律（根据我们的习惯法）、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都平衡，而不受那些玩弄政治、专门在国际上破坏稳定的人的影响，这些人的目的是想在东帝汶插上一脚，以便象1974和1975年那样，再次操纵破坏行动，破坏从人类诞生以前就一直是在东帝汶所在地的这片领土的我们人民的崇高形象。

此外，有些人坚持说，东帝汶仍须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来进行非殖化，这似乎不合逻辑。简直是笑话。我本人和东帝汶人民参加了一场内战，1974年至1976年的葡萄牙革命当局完全抛弃了我们、无视我们，拒绝给予任何帮助。在非洲殖民地非殖化进程开始后一年，葡萄牙展开了一次极不彻底的所谓的非殖化行动。尽管如此，民解阵线仍支持不参加帝汶各政党和葡萄牙政府在澳门举行的会议，而是决定派在解阵线帮助莫桑比克的独立运动。在澳门，帝汶人民民主协会，一个赞成与印度尼西亚合并的东帝汶政党，明确地指出，合并是解决东帝汶问题的最好方法，当时确实是这样。不过，我用“不合逻辑”这个说法是因为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并不是印度尼西亚拒绝遵守联合国关于东帝汶非殖民化的决议，即1960年的第1514(XV)和第1541(XV)号大会决议。而是葡萄牙政府从1960年至1974年的14年间拒绝遵守这些决议。这是为什么？因为1974年之前在葡萄牙有殖民地时，葡萄牙国内享有福利、进步、发展和社会安定，葡萄牙人民接受并喜爱这些殖民地，将其看作世界历史上一个有尊严的民族的一部分。

我们的人民在20年前的内战战场上，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变故和不幸，在葡萄牙却有人坚持说有必要再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在我看来真是很滑稽。为了使东帝汶人民免于自我种族灭绝，葡萄牙外交部长厄尼斯托·梅洛·安东尼斯少校阁下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阁下于1975年11月2日在罗马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就在此57天前，东帝汶民主联盟、科塔、特拉巴希斯塔和帝汶人民民主协会等政党签署了关于东帝汶合并的请愿法令。

如果这些都不算数，那么两个主权国家间的谅解备忘录又有什么意义呢？是一封情书吗？我们可还有其他事要尽力去做。

从葡萄牙人民以及所有曾为该国在“未受到人类侵犯的海域”上的英勇行为感到骄傲的人们的历史来看，诸如葡萄牙和印度之间的条约毫无疑问是个确凿的证据，证明1974年4月政变中建立的新的葡萄牙国家立刻采取了现实的态度，未经公民投票就很快同意把葡属印度领土归还其祖国。代表葡萄牙国家元首签署这项条约的不是别人，正是葡萄牙的现任总统尊敬的马里奥·阿尔伯托·诺布雷·绍雷斯阁下。

我很尊重和敬重印度，但无法看出长时期地策化萨雅格拉哈挑衅同建立入侵武装部队准备公开与在葡属印度境内保卫本国主权和葡萄牙居民的葡萄牙合法正规部队开战之间有什么相应的关系，葡萄牙部队有着军人的荣誉感，但却极不可能进行军事抵抗，除非是凭借所有忠心祖国的葡萄牙官兵的个人勇敢。东帝汶合并入印度尼西亚的法令是在和平与恢复秩序的情况下执行的，是东帝汶人民的代表在完全没有葡萄牙当局参予下通过的。

对于国际法院最近对葡萄牙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争端作出的决定，需要略为回顾一下历史。葡萄牙最初因梦想在东帝汶钻井采油而采取的行动是为了使澳大利亚获利；因此，一些石油勘探合同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澳大利亚公司。这就是说，我必须感谢澳大利亚的努力，感谢它在我们的领土上勘探石油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如果不是这样，现存的可能性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建议从现在起，葡萄牙当局与印度尼西亚当局一道，采取稳妥的步骤，以现实和客观的态度使两国靠拢，作为对秘书长为巩固这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所作努力表示的敬意，这个组织正在纪念人类心甘情愿地为之奋斗的新的希望、和平、秩序、进步与和谐诞生五十周年。

请愿人退下。

应主席邀请，彼德·科拉维托先生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科拉维托先生发言。

科拉维托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美国国会议员尊敬的尼塔·洛伊发言,她因在华盛顿有公务不能出席今天的会议。我感谢能有这个机会就非殖化问题在特别委员会发言。

一个人民选择自己政府的基本权利总是得到美国人民的坚决支持。自决的原则扎根于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并已载入《联合国宪章》。这个原则同非殖化联系在一起,是在全世界实现民主的强大力量。显然东帝汶人民还从未享有过这种权利;他们从未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官员或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1975年从葡萄牙的殖民枷锁下解放出来,但在不到一年后,又带上了印度尼西亚的枷锁。现在又增加了许多践踏人权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对那里的局势感到极大愤慨。

美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和世界主要国家之一,必须协助加强《联合国宪章》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特别关心《宪章》关于自决的规定。以这两种身份,我们必须采取坚定而一贯的立场,反对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存在。

过去,美国选择一种平衡的作法,把经济和军事目标同人权目标相权衡,以为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合作可以诱使它扩大人权。自从1975年以来,历届政府都采取这种作法,但是这种作法已经失败。根据各国际人权团体,包括大赦国际和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印度尼西亚政府并没有认真调查人权问题,也没有采取措施执行人权委员会1993年的建议。

联合国现在必须采取更加强有力的立场。我们不能因为得罪印度尼西亚可能产生的后果而缩手缩脚,我们应该回顾我们曾经采取的对南非境内的压迫的成功立场。我们固执地坚持人权保障,使我们看到南非更换政府,南非人民收回了他们的权力。

同人权委员会过去所作的一样,我们必须敦促印度尼西亚让东帝汶向调查人员和新闻记者开放。在向世界其他各国指出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虚弱和它在国内缺乏支持方面,这些调查人员和新闻的报告具有宝贵的价值。印

度尼西亚显然担心它的公共印象:1992年,一名法官判处费尔南多·阿劳若9年徒刑,因为他“在国际社会的眼中给国家带来耻辱”。我们必须向印度尼西亚表明,消除令人难堪的批评的办法不是在于镇压批评者,而是改造被告和囚犯的待遇。

报告和报道虽然有助于唤起国际支持,但是只靠它们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愿意施加压力,确保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执行委员会的建议,确保他们不仅看到他们的错误,而且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必须承认蒂汶人民的权利,我们也必须要他们也这样做。

正如被监禁的东蒂汶独立运动领袖萨纳纳·古斯毛说的那样,“所谓的印度尼西亚临时政府是建立在”1975年12月“被屠杀的蒂汶人的尸体之上的”。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不承认,但是蒂汶人没有采取过有效的自决行动。“文化差异”也不能掩饰政府的虐待。不经过正常审判就拘留关押和政府勾结参与屠杀,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犯罪。

我们必须巩固我们的立场。印度尼西亚必须认识到,蒂汶人的人权和印度尼西亚本国人民的人权是不可谈判交易的。只有东蒂汶人本身进行一次全民表决才能正当决定他们的地位。在减轻人民的投票和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前,国际社会及其自觉的原则不可能得到满足。

我呼吁本委员会、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要认识到听任印度尼西亚的公然践踏对世界人权的明显的危险。我们捍卫东蒂汶人的权利,就是捍卫所有各自由人民的权利。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马里·阿尔卡蒂尔先生(东蒂汶革命阵线(革阵))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尔卡蒂里先生发言。

阿尔卡蒂里先生(东蒂汶革命阵线(革阵))(以英语发言):在我开始作证之前,请让我作为一个东蒂汶人讲几句。我听了其他一些来自东蒂汶的人的证词。对我来说,苏亚雷斯先生赞成印度尼西亚并吞东蒂汶的说法只是陈

词滥调,而且这同他以前的立场完全相反。我理解他现在的立场;我相信他深受印度尼西亚情报机关的压力。因此,我不想同我的同胞蒂汶人进行进一步的辩论。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谴责印度尼西亚。但是我坚决相信,到下一轮蒂汶人之间的会谈时,我们定会再次相互理解。我不想强迫我的老朋友们和我的同胞东蒂汶人同那些现在正在东蒂汶面临监狱和法律程序外处决的危险的那些的人一样勇敢。

这是我20年来第一次在特别委员会上发言,虽然过去我也曾经在大会第四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上发言。我的名字叫马里·宾·哈穆德·阿尔卡蒂里;这是我的真名实姓,不是葡萄牙文名字。我是东蒂汶革命阵线(革阵)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是它负责对外事务的书记。革阵也是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一部分。我感谢各位让我有这次机会在本委员会发言,当联合国在世界许多地区面临困难的时候,本委员会对各欧洲宗主国的殖民领土实现非殖民化进程的贡献光耀照人。

如果没有印度尼西亚1975年12月7日的赤裸裸的侵略使葡萄牙在1974年开始的非殖民化进程突然中止,今年东蒂汶将庆祝独立20周年。1960年早期大会第1514(XV)号决议通过时有70多个非自治领土,现在只剩下寥寥无几。印度尼西亚也投票赞成第1514(XV)号决议。东蒂汶是本委员会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东蒂汶人和一名穆斯林,我首先必须谴责印度尼西亚当局方面鼓励种族间暴力,以歪曲东蒂汶冲突的性质的企图。过去几年中,在东蒂汶的天主教徒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士兵之间是发生过一些宗教事件。然而必须指出,这些事件总是由印度尼西亚当局煽动挑起的。我在这里就清楚地说明,人数不多的东蒂汶穆斯林团体同占多数的天主教徒,或者佛教徒、新教徒和其他宗教少数团体之间从来不曾有任何问题。东蒂汶社会过去一直是和平的,宽容的,它有一个各宗教大团结的精神。我所说的人数不多东蒂汶穆斯林团体的强烈的文化特征过去一直受到所有其他团体的尊重,而且我们都和睦共存。正是这一点使整个东蒂汶成为一个独特的多种族和多宗教社会,与该地区所有其他地方不同。

各位必须相信,要我站在本委员会面前谴责一个穆斯林的领国对我是多么痛苦。但是,正如我们的先知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穆斯林必须捍卫真理和正义的原则。近年印度尼西亚庆祝它的五十周年,但是,东蒂汶将没有任何东西可庆祝。事实上,我们将以集体哀悼来纪念我国遭受入侵和非法占领二十周年,因为几乎我们所有的人民,东蒂汶几乎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庭,都失去亲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消灭。整个家族消失了。当印度尼西亚纪念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时,我们将悼念我们的死者 and 我们的烈士,我们将为我们被占领的国家而哭号。

殖民主义一直同白人联系在一起。葡萄牙现在是管理国,因为它要做管理国,因为这是国际社会的委托。然而在这一个千年将要结束时,我们正目睹殖民主义的新形式,他们或许比我们在以前的欧洲强国下所遭受的殖民主义来的更加野蛮。

国际社会必须以它曾经对付欧洲殖民统治的同样坚定态度来对付这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人的尊严和正义的价值是相同的。不能对欧洲人是一套正义和规则,而对受南方区域殖民扩张主义大国统治的殖民地人民则是另一套。

特别委员会处理东蒂汶问题迄今几乎已有20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在这个会议厅内被指控为不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前殖民国家葡萄牙,正在这里捍卫我们人民的自决权利。我们同样在这一会议厅内,不是在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而是在谴责一个身为不结盟运动主席的第三世界国家对我国东蒂汶的非法占领。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似乎正在东蒂汶重演。我们回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父、已故苏加诺,他为其国家的独立而战斗,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和监禁。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领导人萨纳纳·古斯毛被印度尼西亚当局逮捕和监禁的情况与之等同。我们东蒂汶人感到遗憾的是,一度曾是反殖民斗争榜样的国家现已成为一个殖民国家—我强调“现已成为一个殖民国家”。

本委员会仍然继续处理东蒂汶问题的事实,就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继续承认东蒂汶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然而,自被占领已有20年,我们认为有必要制定新的行动,以使东帝汶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利。

在这方面,我谨赞扬秘书长在1982年11月23日的大会第37/30号决议框架内所进行的努力。由于他的努力,今年6月初在奥地利首次举行了一次30名东帝汶人士参加的会议。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这次所谓帝汶内部对话的结果,清楚地证明东帝汶人不惧印度尼西亚情报当局的大量压力和干涉,在中立的基础上能够就全面解决东帝汶问题取得协商一致。这应可消除关于东帝汶问题是由东帝汶人自己制造的任何概念和神话。东帝汶问题是印度尼西亚制造的问题。

在我国被非法占领几达20年之后,每个东帝汶人都想为寻找解决冲突的办法作出贡献。然而,必须有让东帝汶人更积极参与这一对话和谈判进程的实际可能性。《博格施莱宁宣言》特别载有一个条款,呼吁在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举行每一轮部长级会谈之前召开东帝汶人的会议。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印度尼西亚为何反对在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举行每次部长级会议之前召开进行新的帝汶内部对话的会议。阿里·阿拉塔斯外长在他同葡萄牙外长之间的第六轮会谈结束时表示了这种反对。似乎印度尼西亚害怕东帝汶人,甚至那些被他们强塞入会议的东帝汶人。因此,我们要求印度尼西亚整体接受《博格施莱宁宣言》。

国际法院刚在有关东帝汶的葡萄牙控告澳大利亚的案件中发布其裁决。国际法院在其裁决中坚持确认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以及东帝汶是一个非自治领土。它继续指出,自决权利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

我们欢迎国际法院的裁决,它符合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东帝汶问题的许多决议,这些决议均遭到印度尼西亚有计划的践踏。

我们在欢迎国际法院关于我国自决权利的决定同时,也应提醒人们注意一位著名的亚洲学者、斯里兰卡的M. 维拉曼垂法官的一项单独意见。他的意见指出,

“如果东帝汶仍然是一个非自治领土,那么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责任承认

其自决权利及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如果情况如此——情况显然如此,那么国际法院就拥有一切详实的必要材料,使之可要求实际上在其面前的被告国承担责任。”

我现在谈一下东帝汶本身的局势。人权状况自1月份以来明显恶化。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队放出了所谓“忍者”——即东帝汶人成印度尼西亚人的帮派分子,他们对被认为是抵抗成员的东帝汶年青人进行绑架和暗杀。平民被残酷处决,例如今年1月利基萨城的六人案件。开始,印度尼西亚军事指挥部宣布六人为武装抵抗成员。只是在这一事件被充分暴露,并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施加强大压力之后,印度尼西亚才终于承认其军队进行了又一次冷血屠杀。最近的事件使20年占领期间我们数以万计被屠杀人民的长长的名单又添一例。

在东帝汶至少有20个营在行动,对平民进行全面的打击或监测。阿里·阿拉塔斯外长上星期在日内瓦宣称将再撤出两个营。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阿拉塔斯先生十分清楚:所谓的撤离不过是从该领土的一地换防到另外一地。印度尼西亚军队进行任意的屠杀、强奸和抢掠。它并非象雅加达政权所宣称的那样,到那里维持法律和秩序,更不用说建设基础设施了。

东帝汶抵抗运动领导人萨纳纳·古斯毛仍在狱中,尽管对他的审判被普遍谴责为是一场骗局。萨纳纳的唯一罪行就是纳尔逊·曼德拉、韦尔特·西苏鲁、昂山苏姬和很多自由战士的罪行,他们由于自己及其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几乎在狱中熬过一生。面对非正义和非法的军事占领,面对对我们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萨纳纳·古斯毛一次又一次伸出对话与和平的橄榄枝。他的诚意姿态得到的只是更残酷的武力和羞辱。

最后,我谨提醒委员会注意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大会关于非殖民化的宣言所承担的义务。大会承担起在2000年前从地球上消除殖民主义的任务。东帝汶是大会非自治领土名单上最后剩下的殖民地之一。本委员会不能由于让本组织的一个成员独断或操纵应适用于东帝汶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而让自己失信并让整个联合国系统失信,这些规则就是各国人民自决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

请愿者退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极力避免要求各请愿者遵守议事规则,但似乎我们正逐渐偏离15分钟的时限。我吁请尚未发言的请愿者遵守这一时限。

应主席邀请,艾伦·奈恩先生(《国家》)在委员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奈恩先生发言。

奈恩先生(《国家》)(以英语发言):我叫艾伦·奈恩,我是一位美国记者,也是印度尼西亚占领军于1991年11月12日进行的圣克鲁斯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我在这里要提醒委员会注意那一次屠杀是一次蓄意的国家行为,并要向联合国提供关于这一罪行的责任问题的新证据。

去年11月,我与 WBAI/太平洋电台的艾米·古德曼一道在大屠杀后第一次回到了东帝汶。我看到印度尼西亚军队仍在实行恐怖统治,东帝汶人仍在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抵抗。

印度尼西亚军队及其代理人在帝力无所不在,在农村地区他们的统治更加令人生畏。军队情报人员把乘客从穿越山区的客车上拉下,开往帝力的客车被迫开到帝力海军基地,在那里突击队员对乘客进行搜查和审问,常常不做任何解释就把他们带走。印度尼西亚占领军在村庄广场挥舞着武器,叫喊着跑过街道。一个农村小镇的一名军队情报指挥官告诉我,帝汶人不准有异议,军方坚决阻止帝汶人与外来的访问者交谈。他具体地说,军方要阻止帝汶人通报任何可能传给联合国的消息。

悄声说着话的帝汶人描述了印度尼西亚军队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折磨。采用的手段包括用铁条继续殴打、用剃刀切削、强奸、电击和迫使帝汶人吞下带在脖子上的十字架。贝洛主教告诉我们,当时的控制和恐怖气氛是他在1983年以来在东帝汶所看到的最坏情况。

尽管如此,帝汶人越来越公开地抵抗。在克林顿总统前往雅加达与独裁者苏哈托一道出席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首脑会议时,29位勇敢的东帝汶青年和平地占领

了美国大使馆场地。他们提醒注视着他们的世界注意苏哈托对他们的国家犯下的罪行,以及克林顿和美国政府罪恶的同谋关系。与此同时,在东帝汶内,正在爆发起义。不仅仅在帝力,而且在沿海城镇和中部山区都爆发了这些十分大胆、范围极广的抗争。

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11月12日我们第一次试图进入东帝汶时,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将我们逮捕,我们被扣押了16个小时。几天后,我们又一次试图进入东帝汶,他们再次逮捕了我们。但此后我们避开了军方的视线最后进入了东帝汶,我们看到在农村地区明显出现了一种公开的大胆反抗精神。在一个小镇里人们夜间出来朝军方的装甲汽车和卡车扔石头。尽管军方企图通过让更多的人失踪和加剧折磨来压制公众的反抗,帝汶人继续公开地愚弄占领者,尽管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便将家人至于危险之中而且有丢掉生命的危险。

在谈到东帝汶的情况时,人们谈的是两个基本罪行:第一是非法占领一片外国领土,第二是蓄意大规模屠杀的政策。在谈到罪行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罪犯——具体地说来在这个情况中就是苏哈托将军和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军官,以及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政府中他们的同伙和其他外部大国,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官员。

如果联合国真正要捍卫国际法,它应该立即召集一个纽伦堡式的法庭来对东帝汶的案件进行调查和起诉。印度尼西亚军队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驻留在东帝汶,它杀害了20多万东帝汶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大约为原居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当时主管东帝汶的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头目加托·普瓦恩托上校1990年向我证实了教会消息来源和大赦国际原先估计的种族灭绝行为造成的这一死亡人数。

这些屠杀是按照苏哈托将军和武装部队指挥官从上层确定的一项有计划的政策进行的。我们所经历的帝力大屠杀是说明作法与理论的一个例子。成百上千的士兵挥舞着美式 M-16S 枪支编队向前开进。他们没有要帝汶人散开。他们没有开枪示警。相反,当他们距离被包围正在退缩的人群十几码时便开了火,有组织地打死了他们能够打到的每个人。我看到儿童的身体炸裂了,鲜血四处飞溅,我看到男人和女人被击中后背。军队乘势追击,干掉

了所有尚存者。他们用枪托击破脑壳，用刺刀挑开肚子。他们训练有素、熟练而迅速地进行残杀，至少在第二天仍然继续杀戮。帝汶人估计最后的死亡人数至少有271人。然而直到今天，印度尼西亚军队甚至不愿说出它把尸体放在什么地方。

正如联合国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巴克里·华利·恩迪亚耶先生1994年11月1日所报告的那样，这次大屠杀是：

“一场旨在对付公开表达政治异议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E/C.4/1995/61/Add.1,第48(d)段)

现在确保这场大屠杀的策划者与那些对帝汶发生的其他暴行负有责任者一道受到起诉并将他们关进监狱完全是联合国的责任。如果联合国愿意支持在波斯尼亚这样做，为什么不支持在东帝汶这样做呢？如果联合国愿意支持在卢旺达这样做，为什么不支持在东帝汶这样做？事实上，在帝汶这个情况中已经有大量证据。我们可以先谈谈印度尼西亚的一些高级官员所说的话。他们解释说这场大屠杀是在推行一种政策。

在屠杀发生两天后，印度尼西亚全国武装部队指挥官特里·苏特里斯诺将军在军校毕业生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说道，向聚集在基地的帝汶人那样的一些人是

“捣乱分子……必须将他们镇压……最终必须把他们干掉”。

在讲了这翻话后，苏特里斯诺被提升为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他现在是接任苏哈托的第一人选。

西奥·西亚菲将军后来重申了苏特里斯诺将军的观点。西亚菲这位驻帝力的占领军指挥官说：

“如果在我任内再次发生11月12日那样的事件，也许死伤人数会更多。”

赫尔曼·曼蒂里将军后来补充说明了这一说法。他解释说，蒂力大屠杀是“非常恰当的”。他说：

“我们不对任何事情感到后悔，因为他们(帝汶人)在反对我们，在举行示威，甚至叫嚣反对政府的

话。在我看来这等于是反叛，因此我们采取了坚决的行动”。

在说了这翻话后，曼蒂里将军被提升为参谋长。

仅仅上个月，印度尼西亚外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进一步奖励了现在已从军中退役的曼蒂里，任他以印度尼西亚驻澳大利亚大使的政治要职。曼蒂里的提名在澳大利亚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斯·埃文斯先生——他本人就是拥护占领东帝汶的一位顺从的支持者——不得不说如果曼蒂里将军能够对他的话表示悔过，那将“非常有好处”。然而即使埃文斯先生提出了这个政治上的解脱办法，雅加达仍然不愿意否定大屠杀。

阿拉塔斯先生的外交部却公开重申政府的屠杀政策。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在今年6月29日发表的一份正式声明中说，如果1991年帝力的示威是

“由那些要破坏合法建立的当局的扰乱治安团伙的成员组织的，那么保安机构不得不采取行动。尽管可能会遭到错误的解释，但是曼蒂里将军当时发出的信息是无可争议的，因此我们认为没有理由道歉。”

除了这些话和特别报告员恩迪亚耶先生已经收集的证据外，我现在想向联合国提供来自美国军事情报机构档案的一个证据。这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封以前保密的内部电报。该电报引述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本尼·穆达尼将军的话说：苏特里斯诺将军

“去年11月在东帝汶帝力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是政治自杀”。

这封以前保密的电报注明的时间为1992年4月6日东部白昼时间14点30分。尽管穆达尼认为大屠杀会伤害苏特里斯诺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份电报是一个爆炸性的内部证据，它看来把苏特里斯诺与屠杀联系起来。

应该把穆达尼将军和苏特里斯诺将军带到联合国召集的一个法庭面前，让他们宣誓接受审问。穆达尼对大屠杀的情况了解多少，具体的说对苏特里斯诺在其中担当的

角色了解多少?苏特里斯诺向地区指挥官辛童·帕尼亚伊坦将军,并通过他向帝力当地的指挥官瓦鲁乌将军和加托·普瓦恩托上校下了什么命令?同样,联合国法庭应该要求美国及其国家安全局对截获的有关苏特里斯诺与其部下之间涉及大屠杀的电话、无线电和其他方式的联系的所有情报资料销密。由国家安全局和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共同管理的设在澳大利亚的监听站截获的这些情报不仅将揭露印度尼西亚军方的罪行,而且也可以澄清美国和澳大利亚事先对印度尼西亚军方的计划知道多少的问题。

应指出,关于这次大屠杀的一次法律诉讼已经完成。去年11月,波士顿美国联邦区法庭就潘贾丹将军在这次屠杀中的作用对他发出了一个缺席判决。在这一案件中——一个外国公民根据美国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和国际法原则进行的民事诉讼——发现潘贾丹应对1400万美元的损坏负责,这笔钱他应付给屠杀的一名受害者、新西兰公民卡马尔·巴马哈吉的母亲。附带说一下,潘贾丹逃离美国并拒绝付款。巴马哈吉的母亲已经宣布,如果他付款,这笔款将分发给所有屠杀受害者的家属。

这样的法律诉讼虽然是有意义的第一步,但对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其原因之一是,东帝汶案件急需进行刑事起诉,另一原因是,从政治上说美国法院都不会愿意公平起诉在侵略和种族灭绝中同谋的美国官员。

这就是联合国必须介入的许多原因之一,这里考虑到的不仅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的杀人犯,而且还有他们在世界各大首都的后台老板。正如引用大会一项决议的纽伦堡决定所指出,那些因“种族灭绝罪”受处罚者不仅包括主要人物——那些在实地发号施令并扣动板机的人——而且还有其“同谋者”,不管他们是个人、公职官员还是政治家。

我已将国防情报局的一份电报的抄件带来,请委员会阅读。我相信会把它转交给有关当局。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沙夫女士(亚洲太平洋东帝汶联盟)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沙夫女士发言。

沙夫女士(亚洲太平洋东帝汶联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亚洲太平洋东帝汶联盟,东帝汶警界网络加拿大声援东帝汶小组是其成员之一。

今年召开非殖化特别委员会会议使全世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这一听询会也使联合国五十周年更有意义。这一会议对这两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有机会使当前全世界肯定联合国的基本信条具有具体含义。这些信条之一是各国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20年前,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侵入了一个新生的小国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自从那时以来,这个小小的但却盛产石油的国家中的勇敢而温和的毛布雷人遭受的是猖狂无视他们的人权和经济、政治权利。1975年以来,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死亡或被杀害。那是令人惊愕的20万具尸体。它的丰富资源受到无情的掠夺。印度尼西亚同诸如澳大利亚政府等其他贪婪的政府共谋,使它的檀香木蕴藏枯竭。咖啡作物被占用,并使其石油蕴藏萎缩。

尽管东帝汶人英勇反抗,印度尼西亚的意图仍在于使这一前葡萄牙殖民领土彻底同化。反抗发生在各条战线上:在山区、在街道、在各大学、在媒体中、在联合国大厅里、在各国人民的心灵和思想中。为东帝汶人民斗争加油和鼓舞是一场日益壮大的国际声援运动,它帮助把毛布雷人民自由的火炬带到境外。这一基础广阔的声援运动还突出了为推进一个人民的正义事业的声援关系和活动的意义。也正是这个运动帮助向全世界其他各国爱好自由的人民宣传了东帝汶的这一现实。

国际声援戳穿了印度尼西亚吞并这块领土的所谓合法性,这不是一件小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站在这一运动最前沿的是亚洲太平洋东帝汶联盟。在这一时刻,我们和联盟重申我们声援大会和本委员会关于东帝汶采取的积极立场。大会历次决议和本委员会举行的听询会,鼓舞了我们继续为东帝汶争取自由。

然而,印度尼西亚继续采取顽固态度以及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令人沮丧地无能为力执行其集体意志,使我们感到丧气,这一集体意志实际上是指责印度尼西亚入侵和占领东帝汶。因此,我们向联合国提出的挑战是,以宣布12月7日为国际声援东帝汶日来使其50周年纪念更有意义。它现在可以这样做,正如它宣布每年11月29日为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一样。

印度尼西亚于1975年12月7日入侵东帝汶。这一入侵的20周年纪念是1995年,而12月7日离开联合国人权日12月10日只有3天。宣布声援东帝汶国际日将使联合国有机会将其词藻变为更有象征性和实际意义的行动。这样做将使联合国把12月7日作为印度尼西亚无耻入侵东帝汶日印入史册,加强其会员国对东帝汶最终解放的承诺,并使解决东帝汶问题的国际努力有一个焦点。

最近举行的大量首脑会议力图使各国和文明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努力解决我们时代的紧迫问题。饥饿、贫困、异化、不容异己和环境退化等等—已经有很多采取具体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的动听言词。目前需要的是,执行有关政策和行动。联合国能够通过宣布12月7日为国际声援东帝汶日而在高谈阔论之外再向前迈进一步。

在那之后,联合国还应对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声援小组在本委员会举行的听询会期间提出的许多措施采取行动。亚洲太平洋东帝汶联盟对本组织提供一个讲坛使东帝汶问题中争执各方畅所欲言深为感激。我们希望通过今天在这里发表的各种证词,20万名死亡的东帝汶人的悲惨呼声将再次在联合国大厅中回荡,并希望将唤醒世界各国人民的集体良知。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约翰·米勒先生(霍伯特东帝汶委员会和澳大利亚东帝汶协会)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米勒先生发言。

米勒先生(霍伯特东帝汶委员会和澳大利亚东帝汶协会)(以英语发言):虽然今年东帝汶问题在世界各地大量曝光,但迄今为在东帝汶人民的处境还看不出有所改善。

我们想提请委员会注意在东帝汶仍没有一个公认的管理国,因而,东帝汶领土全体居民的福利得不到保护、爱护、支持和关心。

负责管理自治和非殖化进程的管理国葡萄牙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未能行使这一职责,部分原因是无能,部分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在1975年以及其后的侵略行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1975年和1976年阐明的印度尼西亚的责任有三方面:从东帝汶撤出它的全部军事力量;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在任何时候都要同秘书长合作。

结果是葡萄牙只能保护和照料那些居住在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境外的东帝汶人,而印度尼西亚却不承担责任保护和照料所有居住在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境内的东帝汶人。印度尼西亚关于东帝汶人民的声明经常提及“必须”向东帝汶人开枪,“格杀勿论”。

在很大程度上,20多年来,东帝汶的罗马天主教会设法通过保护、爱护和关心全体东帝汶人的安全和福利来填补这一空缺,但是它缺乏设备、资金和执行这一职能的自由。

《联合国宪章》第73条阐明:

“联合国各会员国,于其所负有或承担管理责任之领土,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承认以领土居民之福利为至上之原则,并接受在本《宪章》所

建立之国际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量增进领土居民福利之义务为神圣之信托”。

因此,《宪章》扩大了有关“神圣之信托”的义务,但它没有提供解决东帝汶这种局势的手段,在东帝汶没有任何承认的管理国存在并致力于“居民的福利”。

《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曾明智地理解:

“所有未独立民族盼望自由之殷切及此等民族对于达成其独立所发生之决定性作用”(第1514(XV)号决议,序言部分第3段)

“世界各民族热望各种形式之殖民主义一律终止”(同上,序言部分第6段)。

以及

“解放之过程不能抗拒,亦不能倒转。”(同上,序言部分第9段)。

“我们相信,各位都非常熟悉该《宣言》的7点,但是我们要特别提请各位注意其执行部分第4和5段:

“对未独立民族之一切武装行动或各种压制措施概应停止,使彼等能和平自由行使完全独立之权利,其国家领土之完整应受尊重。”

“在托管领土及非自治领土或其他尚未达成独立之领土内立即采取步骤,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按照此等领土各民族自由表达之意志,将一切权利无条件无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独立及自由。”

大会曾于1965年承认在殖民统治下各国人民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斗争的合法性,并敦促各国为殖民地领土内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

在签署1960年《宣言》二十五周年时,联合国又再次重申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并指出:管理国有义务在有关领土创造条件,使其人民能够自由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以及必须在此等人民当中培养一种意识,使其认识到他们在行使该权利时可供选择的各种可能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要提醒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行使其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义务。我们还要提及各委员会通过行使赋予它的权利可以为援助东帝汶人民作更多工作的各种手段。委员会有权利同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所有涉及殖民地局势的机构进行协商。它可以在总部和国外举行研讨会、大会和圆桌会议,并举行特别纪念活动,以突出仍在为自决、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各国人民的苦难。本委员会可以制定或要求制定和传播所有非殖化方面的新闻,还可以对殖民地人民提供这种新闻。本委员会可以请秘书长、会员国、专门机构和对非殖化特别感兴趣的非政府组织同秘书长合作,并在各自主管范围内进行和加强大规模传播非殖化新闻的工作。本委员会还有权派特派团同殖民国家进行协商,收集第一手情报并对在非自治领土内举行的任何磋商或选举进行监督或观察。这种特派团的成员有权——而且我们要表明,有义务——不仅同管理国代表会面,而且还要同尽可能最多的非自治领土居民会面。在没有承认的管理国存在的地方,本委员会似乎有更大的义务进行访问和定期评估。

但是,在过去三十五年中,本委员从未派出这样的特派团。它没有向东帝汶人民传播有关其作为殖民地人民所拥有各项权利的情报,也没有设法培养对其可以作出的选择的意识,除了偶而有关于首都市内局势的报道外,东帝汶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遗忘的人民。同样,东帝汶人民仍不知道本委员会的审议情况及其各项报告和建建议,也不知道本委员会有权代表他们采取什么行动。

联合国在过去20年中曾派出四名特别代表赴东帝汶。它把东帝汶问题一直保留在本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议程上,现任秘书长已能够在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和有限的几名东帝汶代表之间举行几次会晤。我们要说明,这是整个联合国特别是本委员会至少而不是最多可以做的工作。

虽然葡萄牙必须对其没有在1960年至1975年间在东帝汶实现非殖化承担责任,印度尼西亚也必须为自其1975年入侵以来在东帝汶发生的20多万人死亡承担责任,但是使东帝汶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国致力于确保其人民安全和福利及其和平自由地迈向自决和独立的“神圣之信托”的最终责任必须由联合国来承担。

因此,我们敦促委员会更积极地采取行动以确保《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不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是照顾和保护东帝汶人民及其安全、福利和自由的积极蓝图。

我现在代表澳大利亚—东帝汶协会发言。

首先,我要赞扬委员会听取的一些请愿,包括我刚才代表霍巴特—东帝汶委员会所作的请愿,该请愿概述了委员会可以为解决占领东帝汶问题采取的措施。这将是一个简短的发言。我们知道许多个人和团体都提对必须解决这场持续危机感到关切并都已发了言。

在写稿时,包括一名三个月大的婴儿在内的18名东帝汶人正被收留在澳大利亚一个被隔离的地方,即柯廷空军基地拘留中心。他们逃避对其本国的占领,乘船来到澳大利亚。有可靠消息称,这18人中许多人都在东帝汶受过酷刑。我国政府一直将这18名船民置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我们怀疑这是为了使该问题不受这里的主要媒介注意。这一点似乎已经实现。我们请各位对这些人予以特别注意。

我们于6月30日获悉国际法院关于《帝汶隘口条约》合法性的决定。澳大利亚在一个技术性细节上获胜,许多澳大利亚人同我们一样都知道东帝汶的情况,他们曾希望葡萄牙胜诉。从而使《条约》失效。澳大利亚政府在同东帝汶占领当局合作时自愿地被拉入欺骗的罗网。在这方面,特别是就《帝汶隘口石油条约》,它受到了澳大利亚公众日益强烈的抗议。

除了同印度尼西亚政权签订的《帝汶隘口条约》外,一个在澳大利亚激起特别愤怒情绪的问题是印度尼西亚下一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的身份。被提名者是最近退休的印度尼西亚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赫尔曼·曼蒂里中将。他在1991年帝力大屠杀六个月后曾接受采访说:

“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遗憾,发生的情况是非常适当的。他们反对我们,进行示威,甚至呼喊反对政府的口号。对我来说,这等于反叛,因此,这就是我们为何采取强硬行动的原因。若他们现在仍试图这样做,我将不予容忍,我将命令我们的战士采取强硬行动。我们能够学会很多东西。因为有经验我们获得了成功。没有实践的理论毫无用处。政策是正确的”。

正如霍巴特东帝汶委员会详尽建议的那样,我们也敦促各位加紧解决东帝汶僵局。联合国正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能够同东帝汶各界和其他有关各方合作,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敦促本委员会在公正解决东帝汶问题方面发挥其自己的积极作用。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康斯坦西奥·平托先生(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在委员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平托先生发言。

平托先生(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理事会)(以英语发言):我叫坎斯坦西奥·平托。我在东帝汶地下运动中是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理事会(抵抗运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前任书记,是1991年11月12日遭到印度尼西亚部队屠杀的和平示威的组织者,现在任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理事会驻联合国和驻美国的代表。

作为东帝汶被占领的受害者,我对这个委员会必须年复一年地不停地讨论我们的自决权问题感到遗憾。近20年来,这个委员会听到了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东帝汶抵抗运动关于印度尼西亚军队侵犯帝汶人民的基本自决权和其他人权的许许多多请愿。

自印度尼西亚于1975年12月7日入侵东帝汶以来,联合国已通过了10项决议,称这种入侵为非法行为,呼吁印度尼西亚从东帝汶撤军,并承认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

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无视这些决议，对帝汶人民采取了种族灭绝行动。他们杀害了超过200,000人——占帝汶原有人口的三分之一。有许多受害者是我的亲戚和朋友。我本人也被印度尼西亚军人毒打。今天，仍在有系统地继续公然侵犯人权。仅在1995年就有几百名平民被任意逮捕或遭到毒打和法外处决，诸如今年1月21日利奎加镇6名平民被杀害的事件。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说，东帝汶是印度尼西亚“鞋子里的一块石子”。至今已将近20年了，阿塔拉斯先生和他的政府还不能或不愿从他们的鞋里拿走这块石子。二十多年来，对东帝汶的占领使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舞台上大为丢脸，其声誉日益受到破坏。

东帝汶人民二十年来对占领进行的抵抗证明了我们的自决权是不可否认的。印度尼西亚常常争辩说，它已将东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说这是依据巴厘波宣言的既成事实。然而，巴厘波宣言是个骗局。该宣言已被其签署人所否认。例如，原帝汶帝米总督、巴厘波的签署人之一吉赫尔穆·冈萨尔文斯先生最近在奥地利斯兰宁堡的帝汶内部会议上说，巴厘波宣言是不真实的，他已撤回他的签字。除了这控告之外，冈萨尔文斯先生还敦促东帝汶人民行使其自决权。

为了帮助印度尼西亚政府重建它近20年来受到破坏的形象，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理事会提出一项和平计划。这项和平计划已得到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支持，包括欧洲议会的许多成员国、美国国会、加拿大议会、澳大利亚议会和日本议会。

这项计划除了得到国际支持外，还得到帝汶人民、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例如菲律宾的领导人物的支持。

请允许我详细介绍抵抗运动全国理事会的计划。

第一阶段包括在秘书长主持下的印度尼西亚—葡萄牙会谈，有东帝汶参加，以期结束在东帝汶的武装活动；释放政治犯；减少印度尼西亚的军事人员；撤走军火；扩大红十字会的活动；减少印度尼西亚的文职人员；进行人口普查；让联合国专门机构进入该地区以便恢复和保护环境、

重新安置人员、展开地区发展工作、为妇女和儿童提供保健服务、进行公共卫生和免疫工作；恢复一切人权；取消对葡萄牙语的限制；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权委员会；建立联合国驻东帝汶的机构。

第二阶段是向自治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东帝汶人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地方机构民主地管理自己。这就需要在联合国监督下民主选举一个任期五年的当地议会。只有东帝汶人才能选举和被选举。议会将选举一名任期五年的东帝汶总督，这位总督的权力包括与国际关系、投资、财产、移民及其他事项有关的立法。将撤走所有印度尼西亚军队，进一步减少印度尼西亚文职人员的人数；将建立一支由联合国组织的领土警察部队，听从总督指挥。该领土将没有军队。第二阶段可根据印度尼西亚居民和东帝汶居民双方的共同意见予以延长，双方居民可通过公民投票表示自己的意见。

第三阶段是实现自决。该阶段包括为自决公民投票作准备，公民投票将在这个阶段开始后一年内举行，民众通过投票选择是自由联合、并入印度尼西亚还是独立。

抵抗运动理事会的和平计划是温和的和可靠的，对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双方都有利。

近20年来，印度尼西亚政府因为它在东帝汶的行为在国际舞台上声名狼藉。印度尼西亚政府现在重建自己的形象，为时还不太晚。此时我谨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接受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理事会伸出的橄榄枝。

请愿人退下。

应主席邀请，理查德·潘甘尼班先生(太平洋问题资源中心)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潘甘尼班先生发言。

潘甘尼班先生(太平洋问题资源中心):大会在1975年12月12日举行的第2439次会议上承认，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1960年12月14日第1514(XV)号决议中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有国家人民都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1993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对继续提出的有关在东帝汶严重侵犯人权的指控表示关切。

因此,我代表太平洋关注资源中心——无核和独立的太平洋运动的一个秘书处——来请愿,对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继续违反人权表示关注。

1975年印度尼西亚入侵原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太平洋地区人民感到震惊。印度尼西亚继续占领该殖民地,把它当作印度尼西亚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东帝汶也是广泛践踏人权的场所。我们希望特别委员会利用这次机会强调我们对这种践踏人权情况的关注,并强调迫切需要让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更加方便地进出东帝汶。我们还促请委员会寻求南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争取在联合国主持下,让东帝汶冲突得到持久解决。

我们支持43名美国参议员1993年7月2日给美国总统威廉·J·克林顿先生的信中所表达的意见,即“美国应该审查它的东帝汶政策”。我们认为,不仅美国政府,而且世界上那些关心的政府,都应该审查它们的东帝汶政策,以期便利在联合国的认真谈判,这些谈判可能改变目前不可接受的现状。这种政策审查应该包括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以及告诉印度尼西亚,1975年以来它对东帝汶的占领是冲突各方都不能接受的。

我们请本委员会立即解决东帝汶冲突,让东帝汶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尽快得到解决,我们认为,印度尼西亚将继续把自己当作是亚洲的一个主要殖民国家,并且无疑会继续利用“多米诺理论”,入侵其他的邻近国家。绝不要把这种看法当作玩笑,不加重视。

应该告诉印度尼西亚,找到办法让东帝汶选择它自己的未来。印度尼西亚还应当让人道主义组织更多地访问东帝汶和政治犯,包括古斯毛先生。必须提醒印度尼西亚,关于东帝汶未来的任何谈判必须包括古斯毛先生,以便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探索争取全面解决东帝汶问题的一切可能办法。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只要请印度尼西亚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撤走

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军事人员,并让东帝汶人民选出代表,在他们自己的立法机构中代表东帝汶人民。所有这些和其他有关的行动计划,都应该在联合国、联合国机构,以及印度尼西亚、葡萄牙、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政府的谨慎指导下加以执行。

我们要请委员会积极确保东帝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因此,我们建议特别委员会考虑下列建议。首先,委员会应该承担责任,采取适当行动解决东帝汶冲突,因为委员会事实上负责象东帝汶这样的国家非殖民化的工作。

其次,应该请美国、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政府同联合国合作,为东帝汶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应该支持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就东帝汶未来问题所采取的现行主动行动。

第四,联合国应该指责那些继续反对葡萄牙支持东帝汶的道德义务的国家政府领导人。应该进一步指责这些领导人支持东帝汶目前的现状,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下,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违反人权记录。

第五,联合国应该确保印度尼西亚人知道,根据国际法的普遍原则,按照有关非殖民化的准则,东帝汶仍然被看作是一个非自治领土。

我们十分关切东帝汶境内继续违反人权的情况,并且通过本委员会,请印度尼西亚履行人权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协商一致同意的一项关于东帝汶人权状况的声明中提出的各项建议。东帝汶冲突可以通过国际法的普遍原则得到解决。我们请委员会急迫地决定东帝汶人民的未来。

请让我重申,无论对东帝汶人民动用哪种武力,我们都将继续支持他们争取自由、正义与和平的斗争。他们的理想永远不会消亡。他们总有一天能够自豪地说,他们是主权的东帝汶国家的公民。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让尼娜·格恩里女士(亚洲人权观察组织)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格恩里女士发言。

格恩里女士(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以英语发言):亚洲人权观察组织对东帝汶的政治地位问题不采取任何立场。然而,我们认为委员会在审议和讨论非殖民化的问题时,应该充分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

亚洲人权观察组织欢迎联合国未按法律程序、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巴克里·瓦利·恩迪亚耶先生关于他1994年7月访问东帝汶及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他的工作的合作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证实了许多独立的人权组织关于1991年11月12日在帝力发生的杀人事件以及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反应的调查情况。恩迪亚耶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批评印度尼西亚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比如他说,政府任命调查这起杀人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没有独立性,委员会成员中没有一个是进行这样的调查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他建议,除其他外,印度尼西亚政府对这起事件进行一次更加彻底的调查,为受害者家属提供赔偿的办法,并采取步骤,结束对践踏人权负有责任的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成员逍遥法外的状况。

1995年3月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关于东帝汶的人权状况的一份主席声明中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并对被杀人数情报不全和仍然有人下落不明,表示关切。委员会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调查那些失踪人士”(E/1995/23,第590段),并执行委员会以往协商一致声明中所载的各项建议。我们强烈赞同委员会的关注和建议。

自从我们上次在本委员会发言以来,东帝汶境内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1994年10月西爪哇茂物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之后局势明显恶化。最严重的侵犯行为涉及印度尼西亚士兵1995年1月在帝力以外

的利基萨杀害六名东帝汶男人。这次枪杀事件是东帝汶境内的一个更加广泛的践踏人权的模式的一部分,这一模式中包括失踪、非法逮捕和拘留,以及剥夺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

最初,军队报告,1月12日在利基萨有六名游击队员在与军队的冲突中被杀。这种说法与来自当地教会的消息相矛盾,教会说,被杀的都是平民,而且士兵在这一地区放火烧房,并且拘留了一些村民。

这一杀人事件引起国际强烈抗议。苏哈托总统指示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萨尔·丹戎将军展开官方调查。2月7日,以苏马纳准将为首的一组来自武装部队总部监察主任办事处的军官们,前往帝力进行调查。与此同时,陆军参谋长受指示设立一个军人荣誉委员会,以根据调查的结果采取后续行动,并提出对被发现已经违反军事程序的士兵的纪律处罚措施。我们应该看到,1991年帝力大屠杀发生后,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程序。那一次,调查的方式和纪律惩罚措施的性质都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许多批评意见也可以适用1995年利基萨事件的官方调查,其中包括缺乏公正性、缺乏专家技术、缺乏透明度、以及证人缺乏保护。

1995年2月16日,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五名成员抵达帝力,调查杀人事件。这是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1993年成立之后第二次访问东帝汶。他们分别于2月19日和24日两次访问杀人地点,据报道采访了10个证人,其中包括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和耶雷米阿斯·凯斯中尉。

与此同时,军方发表了它所说的事件过程。费萨尔·丹戎将军说,约45名游击队员一直在策划袭击利基萨镇,如果军队不迅速采取行动,利基萨可能已变成一个游击队基地。他说,被杀的四人是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的人,其余两人是实际参战者。丹戎声称,这六个人都是在破获一个游击队的一个藏身地的行动中被杀的,四名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的人是在设法逃跑时被杀的。

3月2日,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它有关利基萨惨案的报告和它截然不同的调查结果。委员会指出,它发现的证据证明,这六个受害者在死之前都曾经遭受酷刑,并且指出,士兵们草菅人命,把这六个受害者置于武装冲突之中。最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强调,所有这六个受害者事实上都是平民,或非作战人员。该委员会尖锐的报告证实,1月12日杀害六名东帝汶平民的惨案公然践踏人权。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得到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肯定。报告还促使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一些成员建议委员会在帝力设立一个分部。

4月9日,军人荣誉委员会宣布它将起诉两名士兵,即耶雷米阿斯·凯斯中尉和一等兵鲁斯丁·莫默拉违反军事程序,造成六名东帝汶平民死亡。检察官说,凯斯下令处决,违反了他的军人誓言,损害了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在东帝汶的形象。

在一次单独审判中,本身为东帝汶人的鲁斯丁说:6名被杀者都是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成员。他供认,他在以行刑方式射杀之前把他们捆绑起来。1995年6月,军事法庭判处凯斯4年零6个月的监禁,并令他复员。确凿的证据表明凯斯因未执行利基萨地区第1638军事指挥部指挥官陆军中校特里斯-苏里亚特曼的命令而有罪。一级兵鲁斯丁-莫梅雷由于其在屠杀中的角色,而被判处监禁4年并被复员。这两人被证实是在执行其指挥官调查扰乱安全运动的活动的命令时,犯了一个错误。根据命令,他们本应生擒属于这一运动的人并只在以武力手段拒捕时才使用暴力措施。两名士兵还被指责未向其指挥官报告这一事件。

设在雅加达的人权组织政策研究和宣讲学院指出,凯斯和莫梅雷基本上得到比犯下1991年帝力屠杀的军官更严厉的判决。对任何安全军官所处的最严厉的判刑为18个月。我们还要强调,利基萨屠杀的2名被告不是因屠杀6名东帝汶人、而是应违背其上级的命令和未报告事件而受到惩罚。印度尼西亚政府仍未公布对屠杀的正式调查的结果,也未采取步骤向受害者家属提供补偿。受害者家属不感出来认其亲属的尸体。关键的是要对利基萨屠杀进行彻底独立的调查,以及全面起诉和惩罚对此所负有责任者。

数百件未决的失踪案仍待解决。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继1991年帝力射杀事件之后或在更最近的事件中仍然失踪者提出说明方面,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进展。联合国关于强迫或非自愿性失踪的工作小组检查了东帝汶人员失踪的情况。截止其最近的报告时,仍有375件未决的案件;据说224件与帝力屠杀有关。根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东帝汶所收集的证据,被杀人总数估计在150至260之间;而其他估计则为大约400人。司法外、草率或任意处决情况特别报告员的结论为:自全国调查委员会完成其调查以来,印度尼西亚当局未进行任何制度化和有组织的努力,以说明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命运。此外,当局也未允许国内和独立的国际人权组织进行调查。

在最近报告的东帝汶失踪案件中,有一些发生在1995年2月5日。5人被从遭监禁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夏纳纳·古斯毛的妹妹阿芒迪纳·古斯毛·埃斯波斯托的家中绑架走,然而事实是已于1994年在其房前设立了一个军事哨所,以监视进出者。5人中有3人据信已经逃跑,另2人则一直未见到过。

亚洲人权观察记录了一种日益严重的任意逮捕和平示威者和据称以扰乱安全运动或反合并运动有关的手无寸铁平民的趋势。这些逮捕通常是在无充分的正式逮捕证情况下进行的,并随后在无审判情况下关押数日到几个月。被关押者通常被禁止与外人接触,并受到酷刑和其他的恐吓。这种行为的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1995年1月逮捕在东帝汶大学参加和平示威的学生。其他任意逮捕事件涉及到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军事情报单位。东帝汶的军事审讯中心常常用来关押刚遭到逮捕的东帝汶人;这些设施中的酷刑是普遍现象。

在继1994年11月的亚太经合会会议之后的3个月中,对东帝汶的各种反合并示威和抗议的镇压显著增加。在亚太经合会会议及1991年帝力射杀事件周年之日的同时举行了几次示威。最引起公众注意的抗议发生在雅加达美国使馆的院内。就在亚太经合会会议开始时,29名东帝汶人于11月12日爬过雅加达美国使馆的围墙,并进而在随后的12天内占据各处地面,要求克林顿总统在会晤苏哈托总统时提出东帝汶问题。29人最终得允许离开而前往葡萄牙,并于11月24日在那里获得政治避难。未能翻过大使

馆围墙的其他40人中,4人在雅加达遭到短暂的关押,另36人则被送回在东爪哇的家,他们在那里上大学。在11月剩下的日子中,这些学生一直被玛琅、任抹和监狱里曾得地方军事指挥部传讯或“训导”;一些人在1995年1月仍受到轻微的骚扰。

在帝力还出现了其他示威活动。至少举行了5次支持独立的示威,纪念1991年的屠杀事件。其中两次示威是在东帝汶大学校园举行的。印度尼西亚针对每一次抗议都部署了防暴警察,得到证实的报告指出:警察使用了棍棒和催泪弹来驱散这些示威。据称一些示威者使用了暴力。尽管外国记者被允许在亚太经合会会议期间前往帝力,然而也有一些报告指出曾试图限制外国记者报道抗议活动。地方官员指控一个日本电视台设制组在大学煽动“制造麻烦者”,后来又经过大约40聚在一起的外国记者最好不要“做任何造成非和平状况的事”。6天以后,包括2名来自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摄影记者在内的4名记者,被赶出帝力,1人遭驱赶的理由是“被发现持有反政府的海报”,另一名遭驱逐的理由是因为他持旅游签证而非新闻通行证前往。2人均被告知“缺少有效的证件”。政府于月底宣布27人将由于其在前几个星期的动乱中的作用而遭到起诉。

当国际上把注意力移升东帝汶之后,发生2种事态:这一次已更严厉的手法逮捕那些涉嫌煽动动乱者;以及出现显然按政府命令行动的成帮的暴徒。12月4日,一位名叫亨德里克·贝尔米罗的前政治犯因被怀疑于11月中煽动示威而遭逮捕。他受到严厉的酷刑,结果头上至少缝了7针。贝尔米罗至少在1980年6月时就是革命独立阵线的成员,他当时因一次袭击政府广播设施的事件而遭逮捕。他在雅加达的芝槟榔监狱被监禁了6年。

1月9日,大约30名学生在东帝汶大学举行了一次和平示威,举起要求施放哈纳纳及表明反对印度尼西亚统治的旗帜。警察指挥官安德烈亚斯·苏吉安托上校说,示威者冲入大学并试图使学生们参加他们的示威,当学生拒绝参加时就暴发了打斗。尚未有对警察就这些事件说法的任何核实,然而事实上很多示威者是在大学注册的学生。其

中24人在200名警察和武装部队成员到达那里封锁大学之后遭到逮捕。4位目睹2名示威者遭警察抓获和殴打的外国观察员,因拍摄事件经过的照片而遭拘留和驱逐。政府官员说,这4人-3人为澳大利亚旅游者,1人为荷兰妇女-被要求“为自己的安全”而离开。根据军事指挥官基基-沙赫纳克里上校的说法,2名外国记者也因为其存在会有“煽动性”而被要求离开。

至1月中旬,雅加达的人权组织报告指出,被逮捕的24人中将有16人受到审判;其他将被释放。路透社的报告指出,16名学生中的5人已被指控敌视政府而被判刑20个月至2年,这一指控的最高刑期为7年。荷塞·安东尼奥·贝洛被指控为这次示威的领导人,被判监禁18个月。

人权组织对这些学生以及其他等待审判的犯人获得律师的问题表示关注。由于1994年11月的示威遭逮捕的6名东帝汶人,据称由1个法庭指派的名叫蓬科·阿特莫诺的帝力律师来辩护,印度尼西亚政府每当出现政治案件时就召唤此人。设在雅加达的为东帝汶人辩护联合委员会的律师报告:学生们受到的压力是不可把代理权授予为东帝汶人辩护联合委员会。

亚洲人权观察欢迎全国人权委员会对利吉萨屠杀进行的调查。我们还希望印度尼西亚政府将继续与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几个工作组合作。然而,如果要想在结束东帝汶侵犯人权的普遍模式方面取得任何实际进展,政府还需采取更多的步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

所有对酷刑、失踪事件,任意逮捕或司法外处决的指控,都应受到立即调查,而被证明负有责任者则应受到最大限度的法律起诉。政府关于派遣一个军队调查小组并成立一个军事荣誉委员会的决定,只有在有助于找出充分的事实及导致起诉更高级别的负有责任者的情况下,才是有意的。

司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情况特别报告员巴克雷·韦利·恩迪亚耶先生,在其1994年11月就1991年帝力屠杀事件提出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应得到充分执行。

东帝汶人应被允许充分行使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受到国际人权法律、而且受到印度尼西亚宪法的保障。

在不久的将来应邀请现任酷刑情况特别报告员以及任意关押情况工作小组访问东帝汶。还应允许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人权组织及国际组织不受阻碍地和正常地进行对人权情况的监测。

利用军事情报部队逮捕和审讯嫌疑犯的做法应立即停止,以避免进一步的酷刑事件。根据印度尼西亚刑事诉讼法典,逮捕和审讯是警察的职责。

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使被拘留者能够立即接触他们所选择的律师,应该使没有特别通行证证的记者能够完全不受限制地进入该领土,以便使侵犯人权问题方面有充分的透明度和公开的报道。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本·温费尔德先生(TAPOL/印度尼西亚人权运动)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温费尔德先生发言。

温费尔德先生(TAPOL/印度尼西亚人权运动)(以英语发言):在委员会两天繁忙的请愿会议结束时作为最后一位发言者不是易事。作为一个医生,我不得不对委员会成员和口译员在精神和体力上必定感到的疲劳表示同情。

我谨代表印度尼西亚人权运动TAPOL表示感谢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就东帝汶问题发言。

在自委员会上次举行会议以来的过去一年里,在努力谋求以国际接受的办法公正、持久地解决东帝汶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态发展,尤其是今年6月初在奥地利举行了所有各方都参加的东帝汶内部的对话。国际上的注意力继续集中在东帝汶问题上,这对该领土的事态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还非常重视国际法院6月30日的裁决:

“葡萄牙主张人民的自决权…对所有人都适用,这一主张是无可指责的”,
以及

“东帝汶领土依然是一个非自治领土,其人民拥有自决权”。

但是与此同时,在占领军手中东帝汶人民的人权不断遭到侵犯。暴力和痛苦的程度没有任何减轻。

长期以来,雅加达政府所实行的政策与驻东帝汶军队的战略之间存在着紧张状况。雅加达政府不断受到国际谴责的压力要它作出反应;驻东帝汶的军队则决心阻止任何抗议的表现,或表示支持国际舞台上所开展的努力。但是在最近几年里,这一紧张状况大大加剧了。

占领军使用了各种手腕来镇压东帝汶人。去年11月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亚太经合会)召开之际在帝力发生了示威活动,保安部队不得不实行克制,因为当时有前往印度尼西亚报道该会议情况的许多记者在场。甚至在当时我们也有眼福看到了武装警察逃离毫无武装的示威者的景象。

今年1月,没有新闻记者在那里碍事,于是采取了高压手段对付包考和帝力的示威活动。包考的确切死亡人数还未确定。在3月份人们遭到了由军队雇佣的“忍者”巡逻兵的恐吓。但是,“忍者”战略却由于团结自卫的当地社区作出了有组织的反应而遭到失败。

但是,1995年1月12日发生的利基萨屠杀事件比任何其它事件都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需要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作出反应与持续存在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冲突引起的紧张状况。利基萨地区的6位村民遭到残酷谋杀,这一事件本身并非偶然。从事谋杀的该领土上的驻军被派往执行一项任务,消灭被认为在该地区很活跃的一支游击队。在这次行动中被围捕的村民被认为是武装抵抗的支持者,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攻击的目标。

有关谋杀的消息传播得很快,这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抗议,迫使苏哈托总统下令武装部队开始一项调查。上个月有两名士兵被定罪判刑。印度尼西亚新闻界详细报道了毫无武装的平民如何被杀害,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手铐蹲在地上被打死。尽管4年和4年半的徒刑与这项罪行根本不相称,但是这次判刑却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次罪犯没有逍遥法外。但是真正的罪犯是那些决定战略的军官和那些对非法占领东帝汶负有责任的人。这一占领要求武装部队对那些无防卫能力的人们进行屠杀行动。

上个月任命了一名新的指挥官负责东帝汶的军事指挥。他是自1991年11月发生圣克鲁斯大屠杀以来被交付安抚东帝汶人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第五位军官。这一人员调整在军事任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每一个新派出的人都尝试用新的办法来摧毁抵抗,恐吓当地人民,但是都没有得逞。曾经某个时候在东帝汶任职肯定能保证晋升军职;但现在在那里任职却是件遭殃的事。

陆军参谋长最近说,在东帝汶对安全的主要威胁是秘密阵线,而不是武装抵抗。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认意味着什么?首先,占领军面临着一场根深蒂固和组织良好的运动。正如该位将军所承认的那样,这一运动不仅包括青少年和学生,也包括公务员。第二,该领土军队的数目将不会减少,尽管几乎访问该领土的所有外交官都要求减少军队的人数。

近期负责东帝汶事务的军官公开警告政府,只要联合国继续插手这个问题,不能指望他们控制东帝汶的局势。他们声称,正是外来支持、世界范围的声援和联合国的作用使那里的抵抗运动十分活跃。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事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外长和葡萄牙外长的会晤,在奥地利举行的东帝汶内部的对话——都成为又一次镇压和更多的人被逮捕以及更多的人“失踪”的借口。

这一定使不幸的印度尼西亚外长在许多晚上失眠的原因,更不用说他手下的那邦驻在世界各地不幸的外交官,他们担负着为合并辩护的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仅在上星期,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斯·埃文斯还把东帝汶称作

“印度尼西亚的切肤之痛”,他承认由于程序原因没有宣布《帝汶隘口条约》非法的国际法院的裁决。

“将不会削弱印度尼西亚解决东帝汶这个继续存在的痛苦的动力”。

阿里·阿拉塔斯外长上个月在访问东帝汶后进一步突出说明了雅加达的困境。他抱愿说,东帝汶目前的情况使印度尼西亚很容易遭到外来攻击:

“有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人权方面的批评。这些事情存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实说,我们的安全机构有时作出的反应过份了”。

他说,他所期望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任何时候无论有谁想到东帝汶,我们就让他们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葡萄牙,能使别国不断把东帝汶作为一个问题”。

阿拉塔斯先生不可能更加坦率了:两种战略互相冲突。一种是要安抚世界舆论并要求通过联合国主持的谈判进行国际解决;另一种则是军方的无可谈判的“安全作法”——基于其粉碎反抗的决心。

而今天,在其中又有另一个因素: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运动。更多的团体介入了争取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斗争,它们深信东帝汶必须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印度尼西亚民主也意味着给东帝汶选择权。

印度尼西亚政府中两派都决心抓住东帝汶不放,这两派之间紧张关系的真正原因是东帝汶人民的决心和勇气。我们敦促本委员会承认他们的决心是国际社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基石。联合国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中可起关键作用。它的关键任务是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民众的人权不受蹂躏并开展自决行动的进程。

今年是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东帝汶第二十年,我们呼吁本委员会建议具体行动以实现这两个目标。

请愿者退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了关于这一项目的听询。我代表委员会和我本人向各位请愿者表示委员会赞赏他们的发言以及他们向委员会提供的信息。

工作安排

委员会将继续审议这一项目并在明天早上的会议上结束这一审议。其后,委员会将开始审议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特别委员会1991年

8月15日关于波多黎各的决定、对一份关于美属维尔京群岛的请愿书的听询、西撒哈拉问题和工作小组的报告。

由于今后两天会议的议程很多,我谨敦促所有成员结束他们关于余留项目的磋商并准备对那些项目采取行动。我还要敦促——我强调“敦促”——各位成员遵守时间。

下午6时35分散会